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對中國歷代大戰略的影響

王 俊 評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博士候選人)

摘 要

地緣政治結構是從地理的角度研究政治、資源、國際權力重心的相對位置分布，並以國家是否控制結構中戰略交通線來決定結構形式，並對結構中各層級單元－地緣政治領域、地緣政治區域與民族國家的地緣政治模式與特徵進行政治地理分析的結構模型，以此研究國家在此種地理關係下的大戰略行為。國家在特定時代的大戰略受到該國的地理環境以及該時代地緣政治結構的影響。東亞在歷史上是一相當封閉的區域地緣政治結構，但做為東亞主體國家的中國在歷史上甚少居於完全的霸權地位，大多數時候東亞地緣政治結構長期在無極、單極、兩極與三極中變化，中國因而經常必須與其他強大力量中心競爭結構中適於中原農耕文明發展與重要國防與經濟利益的地區，使得中國大戰略從西周起就經常帶有明顯的攻勢／擴張傾向，但同時以安撫型戰略手段減少在兩個以上戰線作戰的戰略困境。兩宋與明朝由於地緣政治結構的改變而使防禦型大戰略逐漸取代攻勢／擴張大戰略；而只有在東漢與清朝時期，結構形式為中國完全沒有競爭對手的霸權結構，安撫型大戰略才成為主要的大戰略類型。

關鍵詞： 東亞地緣政治結構、中國、大戰略

* * *

壹、前 言

地理是戰略思想中最主要的基礎之一，①是所謂的「戰略之母」。②大戰略（Grand Strategy）則是在平時和戰時，發展和使用國家資源（包括政治、經濟、心理、軍事四

註① 鈕先鍾，**現代戰略思潮**，再版（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頁 17~20。

註② Geoffrey Sloan and Colin S. Gray, “Why Geopolitics?” in Colin S. Gray and Geoffrey Sloan eds.,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London and Portland, Oreg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p. 3.

種權力）以求確實達到國家目標的藝術和科學。③一般對中國古代大戰略的研究向來運用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與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但二者皆未良好處理地理在理論中的地位而導致許多不足：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主張中國戰略文化具有明顯的「備戰」（parabellum）邏輯，相信使用武力與戰爭在解決衝突效力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本質，因此明朝大戰略具有強烈的攻勢偏好，④但許多明朝參與的戰爭性質卻非攻勢性，而且明朝長城的位置遠比之前的朝代往南，⑤更與攻勢戰略相異；認爲中國大戰略受儒家影響，是崇尚和平的中國戰略文化學者的觀點，⑥則完全無法解釋中國歷代政權的擴張行爲。

三種重新引進地理影響力的現實主義修正理論：威脅平衡論（Balance of Threat）、攻守理論（Offense-Defense Theory）與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都仍限於單元層級以及僅研究自然地理對國家行爲的影響。威脅平衡論認爲國家與潛在威脅的距離遠近是影響國家聯盟行爲的主要原因之一，⑦但國家並不只關注於此，也同時在意潛在威脅與戰略資源、交通線、友好國家的距離。⑧攻守理論主張地理與科技的互動會影響國家對採取攻勢與守勢的考量，當整體條件利於防禦時，戰爭便不容易發生，⑨有助於降低無政府體系中的安全困境，⑩但歷史上常有自然地理與科技情況並未發生改變，大戰略卻發生攻守變化的個案。攻勢現實主義大幅提升地理變數的地位，主張巨大水體（large bodies of water）能阻礙國家對外投射武力，維持國家之間權力平衡的作用要比共同邊界來得有效，⑪但這卻無法解釋何以國家還是會發生海戰與越洋攻擊，而擁有共同邊界的國家有時卻能長期維持和平。⑫王元綱（Yuan-kang Wang）以攻勢現實主義

註③　鈕先鍾，**大戰略漫談**（臺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7 年），頁 9。

註④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16~217, 249.

註⑤　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國**（臺北：三民書局，1981 年），頁 211~212。

註⑥　例如李際均，**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37~238；門洪華，「中國戰略文化的重構：一項研究議程」，**教學與研究**（北京），第 1 期（2006 年），頁 59~60；杜永吉，「論中國戰略文化的近代流變」，**軍事歷史研究**（上海），第 3 期（2005 年），頁 143~145；李曉燕，「中國明代戰略文化與儒家文化一致性的研究—與江憶恩商榷」，**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0 期（2008 年），頁 66~76；宮玉振，**中國戰略文化解析**（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6、20~22。

註⑦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Spring 1985）, pp. 9~12.

註⑧　Jackub J.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graphical Change*（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7~18.

註⑨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Spring 1998）, p. 19.

註⑩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January 1978）, pp. 167~214.

註⑪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86, 271~272.

註⑫　張登及，「理論改良還是缺口？—新現實主義與冷戰後中美地緣競爭的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3 期（2009 年），頁 11~17。

對兩宋與明朝大戰略的研究，便仍以權力政治爲主要出發點，藉此判斷兩宋與明朝的大戰略屬於攻勢性質，缺乏地緣政治分析。⑬此外現實主義也經常陷入結構劃分不一致的情況，例如楊仕樂認爲中國是否出現文化道德主義，取決於中國是否身爲體系的單極或霸權，楊氏似乎認爲二者可交互使用，⑭但實際上這是兩種不同的結構。

本文因此使用結合結構與地理的「地緣政治結構」(Geopolitical Structure) 概念，試圖從結構層次分析古代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如何影響中國歷代大戰略的類型。爲便於論述，本文的大戰略類型採用江憶恩的分類，包括在鄰近區域外以攻勢性、預防性或先制性 (preemptive) 武力使用，目的在藉由兼併某些領土來達成獲取完全軍事勝利或在政治上毀滅對手的「攻勢／擴張」(Offensive/Expansionist)；以外交、政治貿易、經濟誘因、扈從等爲主要戰略手段的「安撫型」(Accommodationist)；武力使用以強調對邊界實施靜態防禦而非兼併或毀滅敵人的國家或政治組織的「防禦型」(Defensive)。⑮本文認爲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在唐朝之前出現過無極、單極、兩極、三極與霸權的多元發展，使得中國大戰略具有明顯的攻勢／擴張傾向；宋朝與明朝的結構特徵則使兩個朝代的大戰略擺盪於防禦型與攻勢／擴張之間，但同時也包含安撫型；只有在東漢與清朝的中期，毫無其他挑戰者的霸權結構才發展出安撫型大戰略。

本文在第貳節首先將分析何謂地緣政治結構，並探討地緣政治結構與國家大戰略的關聯。而在第參節，本文將分析古代東亞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至於第肆節則以前兩節對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的分析爲基礎，對中國歷史上歷代大戰略進行研究。第伍節則爲本文之結論，對本文的研究結果，以及地緣政治結構理論在大戰略研究上的限制提出說明。

貳、地緣政治結構

地緣政治學 (Geopolitics) 係從地理的角度研究國際關係，⑯其結構理論關注的焦點雖與結構現實主義同樣是組成體系的結構與結構組成者的單元 (國家) 之間的互動

註⑬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註⑭ 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 (2006 年 1 月)，頁 221~223。

註⑮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p.112~114.

註⑯ 此一定義係作者整理許多地緣政治學者的觀點之後提出的簡單定義，本文所參考的地緣政治學定義請見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rinter, 1998), p. 5; John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2; Saul B.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p. 12; Gearóid Ó Tuathail, 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 *The Geopolitic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2~3; Patrick O'Sullivan, *Geo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p. 5; Geoffrey Sloan and Colin S. Gray, "Why Geopolitics?" pp. 1~2.

與對彼此行爲的影響，但其判斷結構形式的依據則非結構中國家的相對權力分配，而以國家對結構中的戰略交通線與地理環境的控制能力爲主。

一、地緣政治結構

地緣政治結構理論以學者科恩（Saul B. Cohen）爲代表，主張結構由兩種地理條件組成：「地緣政治模式」（Geopolitical Patterns）與「地緣政治特徵」（Geopolitical Features），前者指地緣政治單元的形狀、大小、自然與人文地理特徵，以及結合這些地理條件，使地緣政治單元獨具特色的網絡；後者則指政治地理的節點（nodes）、面積與邊界等可幫助地緣政治單元增強其獨特性，並影響其凝聚力（cohesiveness）的條件，包括：歷史發展核心、首都或政治中心、人口及經濟發展精華區（Ecumenes）、可供經濟持續發展與人口穩定增長的有效國家或區域領域（Effective National Territory, ENT）、可提供防衛縱深或天然資源的荒蕪地區（Empty Areas）、邊界，以及不服從核心的不一致區域（Nonconforming Sectors）。⑰

地緣政治結構理論強調區域的戰略重要性，因爲區域比國家更具有空間、資源分布與各種地理環境的整體性，國家對結構的戰略重要性則視其所處的區域而定，故結構中各單元對結構的戰略重要性具有階級性。科恩將最高層的單元分爲兩大類：地緣戰略領域（Geostrategic Realm）與地緣政治區域（Geopolitical Region），前者是「世界某個足夠大的區域，擁有全球影響力的功能與特色以服務組成它的主要強權、國家和區域。其架構是由連結內人員、貨物、理念的循環地緣政治模式所形塑，並經由控制具有戰略重要性的海陸戰略通道，將這些模式集合成一個領域」；⑱後者則是由「地理連續性、政治、文化、軍事之間的互動，可能還加上擁有類似歷史與民族的歷史性移民與混居」所形塑，⑲地緣政治區域可能從屬於地緣戰略領域，但也有具備發展爲新地緣戰略領域潛力的獨立地緣政治區域。

二、地緣政治結構變數的層次分析

科恩的模型沒有提出影響國家行爲的主要變數。學者格利吉爾（Jackub J. Grygiel）則彌補此一缺點，他認爲「地緣政治就是資源與交通線（lines of communication）的地理分布…地緣政治局勢是科技與地理互動的結果，這些結果改變了位置的經濟、政治、戰略重要性」。⑳換言之，結構中每個位置因交通線分布而產生不同的戰略重要性，其政治歸屬對國家行爲有極大的影響。陸俊元也提出地緣政治結構中其他影響國家戰略行爲的變數，包括國際政治中的「力量中心」、單元之間的相對

註⑰　Saul B. Cohen, *Geopolitics*, pp. 35~36.

註⑱　*Ibid*., p. 37.

註⑲　*Ibid*., pp. 40~42.

註⑳　Jackub J.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graphical Change*, p. 22.

位置與彼此的距離，以及自然環境特徵賦予國家的「地理力」。㉑地緣政治結構不僅是這些力量間的互動，還受到結構施予單元的向心力與單元施予結構的離心力，以及單元本身的政治向心力與離心力所形塑。㉒

體系的形成依靠國家之間的互動，體系與國家層級的互動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越高越有助於形成體系。㉓交通線則是互動的媒介，沒有交通線就無法產生互動，無從形成體系；交通線分布的範圍越廣泛，在其上流通的貨物、理念與資訊越多，單元之間共享的組織與規範被越多國家接受，體系的範圍就越大，因此全球體系在 15 世紀後才逐漸形成，之前只是多個不同的區域體系並存。㉔體系中越活躍的國家越需要使用那些連結結構中核心區、精華區與資源生產地，對整個體系運作不可或缺的「戰略交通線」。「控制」並非控制交通線本身，而是獲得在衝突發生時依照本身政治意願，決定給予其他行爲者使用交通線的權力，此因交通線的功能是提供人貨的快速移動。獲得此種權力的主要途徑就是以武力或各種政治力量，排斥敵對行爲者對交通線的使用。由於戰略交通線的延伸範圍極爲廣泛，故能控制戰略交通線的國家必爲體系中的超強，是地緣政治結構中眞正的「極」，每個地緣戰略領域包含一條以上由一個超強所控制的戰略交通線，地緣政治結構形式即依此劃分，故國家對交通線的控制爲結構層級變數。理論上，地緣政治結構的形式可分爲無極，海權或陸權單極，兩極、三極與多極，以及所有戰略交通線均爲一個國家所控制的霸權等，其中霸權結構也可以容許結構中存在在地理上遠離霸權的歷史核心，但卻接近戰略交通線，可藉此形成對霸權潛在威脅的力量中心。

控制戰略交通線的重要方式爲對其通過的戰略要地之控制，此可爲交通線的起迄點，或爲有數條交通線同時匯聚的地區，可由此保護己方對戰略要地周邊交通線之順暢使用，並排斥敵方對同一地區內交通線之使用；所控制的戰略要地越多，越能確保對整條交通線的使用。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與孫子都曾指出這種在文獻中稱爲「衢地」或「國家鎖鑰」的戰略要地之重要性：克氏認爲「鎖鑰」是國家中幾條道路交集的地方，或容易儲積物資的地方，或便於朝幾個方向運動，其位置可以使佔有該地的軍隊本身的交通線受敵軍威脅之前，即已能有效威脅敵人之交通線；㉕孫子

註㉑ 陸俊元，**地緣政治的本質與規律**（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 年），頁 248~254。

註㉒ 同前註，頁 256；Saul B.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4.

註㉓ 互動能力是學者布贊對國際權力結構對國家行爲的影響力所提出的解釋變數，指的是「體系中運輸、通訊與組織能力的等級」，其來源包括科技、共享的組織與規範。Barry Buzan,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04; Barry Buzan, "Rethinking System and Structure," in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eds.,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9.

註㉔ Barry Buzan, "Beyond Neorealism: Interaction Capacity," in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eds.,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p. 74.

註㉕ 鈕先鍾譯，Carl von Clausewitz 著，**戰爭論**（臺北：軍事譯粹社，1980 年），頁 724、727。

則認爲「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㉖控制的程度、手段與內涵則隨時代變遷而不同，以本文所探討的時代而言，通常是把交通線經過的地區納爲領土或勢力範圍，實施直接的政治與軍事控制，這種控制與對國內交通線的控制一樣是長期且最高程度的控制，手段則以軍事方式或軍事爲後盾的強制外交爲主。但還有另外一種方式爲使用較柔性的手段拉攏位於要地的國家，屬於間接控制。

三、地緣政治結構對大戰略的影響

地緣政治結構理論並不預設結構形式對國家行爲的影響，單憑結構形式判斷國家行爲容易產生誤差。㉗儘管特定的結構形式似乎會產生一定的行爲模式：單極容易朝霸權轉變，例如羅馬共和國（Roman Republic）統一地中海地區；兩極常有嚴重的對峙，例如冷戰；但很容易出現相反的情況，如 19 世紀的英國與冷戰後的美國都是海權單極，但沒有進一步控制陸上戰略交通線而成爲霸權；霸權也可能維持攻勢／擴張大戰略，如羅馬共和國朝高盧、不列顛與日耳曼的擴張。

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在於結構中主要國家的大戰略分別受到結構（自變數）與單元（中介變數）兩層面的影響。超強除了結構形式之外，還需判斷結構中的海陸分布，以及是否存在其他能威脅國家安全與戰略交通線控制的力量中心。中介變數則包括：

1.國家與潛在威脅的地緣政治屬性－首先決定大戰略應指向陸地或海洋，其次假使與潛在威脅具備相同的地緣政治屬性，通常會因爲關注的地緣政治利益與目標相同而導致具有強硬性質的大戰略，但若有一方能發揮的控制力量明顯弱於另一方，則較弱者的大戰略會因力量差距的緣故而具有較多安撫性質以避免在戰爭中遭重大失敗危及國家生存，即使彼此同爲超強亦然。反之，地緣政治屬性不同的國家，彼此雖有競爭與潛在威脅，但因基本地緣政治利益不同，大戰略的對抗性較爲溫和，除非雙方的擴張侵犯到對方的基本地緣政治利益。此外，對海陸兩種地理性質相異的戰略交通線控制所需的能力完全不同，而且除非在極爲有利的地理環境下否則很難相互支援，因此限制了超強的擴張。

2.政治核心、戰略要地與資源生產區的相對位置及與潛在威脅的距離－協助國家判斷應將戰略重心置於哪一個地區，假使本土的政治核心或精華區，或境內外的戰略要地、戰略交通線與資源生產區靠近敵國甚至擁有共同邊界，通常會產生傾向強硬的手段應付潛在威脅的大戰略。威脅不需要來自另一個超強，超強同樣會因此制定強硬性質的大戰略應付來自次級強國的威脅。

註㉖　徐瑜，**孫子兵法：不朽的戰爭藝術**（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 年），頁 265。

註㉗　Oliver Dollfus, “The World System,” *Geopolitics*, Vol. 5, No. 2（Autumn 2000）, pp. 59~60.

前述羅馬共和國在單極結構中的攻勢擴張大戰略首先受其陸權本質，以及地中海是封閉海域的影響，人文、經濟與自然地理環境有一致的單一性等結構因素的影響，㉘而地中海東部存在能威脅羅馬對地中海內部與周邊海陸交通線控制，又在陸上相連的希臘諸國；羅馬在霸權結構中的攻勢／擴張大戰略則肇因於高盧受到日耳曼部落佔領的潛在威脅，羅馬唯一的解決辦法只有自己佔領高盧，但征服日耳曼則受挫於北歐完全異於地中海的氣候，攻勢／擴張大戰略此後迅速轉爲尋求以自然疆界與戰略防禦應付包括日耳曼與其他各方面威脅的防禦型與安撫型並用大戰略，只在極少數時期曾再度擴張。㉙冷戰初期的激烈對峙肇因於蘇聯在歐亞大陸（Eurasia）的擴張與美國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各自威脅到彼此的基本地緣政治利益，1980 年代則因爲蘇聯海軍遠洋戰力大幅提升嚴重威脅美國對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英國在 19 世紀中的歐洲／大西洋區域地緣政治結構與美國在冷戰後的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初期不向大陸擴張的行爲，源於難以越過海洋在大陸上發動戰略交通線控制作戰的結構限制，以及重視貿易多過領土安全的地緣政治屬性。

參、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的演變

東亞在地理上包括東北亞與東南亞，但古代東亞地緣政治結構並未涵蓋全部的東亞，菲律賓、大部分印尼與馬來西亞地區皆未與身爲東亞核心國家的中國或其他東北亞國家發生密切的互動，因此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的範圍僅包含互動密切的東北亞與中南半島。

東亞具有明顯的地理封閉性，既缺乏能從海上深入內陸的海灣，又受到喜馬拉雅山脈、青康藏高原、天山等崇山峻嶺，和山脈所造成的高原與沙漠氣候包圍，不易與其他地緣政治體系發展密切的互動。其次在內部也受到嚴重的自然地理切割：東亞大陸與外部的「島鏈」隔著相當寬闊的海域，使得兩者之間的互動甚爲緩慢與稀少；其次，東亞南方爲熱帶雨林所遮蔽，中南半島北部與中國西南部之間又有險峻的縱谷地形，北方與西方則有廣大的高山、高原、草原與沙漠，氣候與地形皆不利中國與中南半島、西藏、新疆、蒙古等地區的交流，大部分中南半島地區遲至 13 世紀以後才逐漸被納入以中國爲主導的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內。最後，中國內部東西流向的大河形成所謂的「平行河川體系」，對中國的南北往來與政治統一構成重大障礙，㉚雲貴地區更由於地形崎嶇，在歷史上長期擁有半獨立甚至完全獨立的政治地位。

註㉘ 曾培耿、唐家龍譯，Fernand Braudel 著，**地中海史**（第 1 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 年），頁 285~288。

註㉙ Edward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註㉚ 蔣君章，**政治地理學原理**（臺北：中外出版社，1976 年），頁 177~178、180~182。

古代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可分爲 13 個不同的地緣政治區域：日本列島、蒙古、㉛西域（塔里木盆地與天山）、滿州（Manchuria）與朝鮮半島、㉜華北平原、黃土高原、四川盆地、長江中下游、雲貴高原、華南、青康藏高原、印度支那（Indo-China）、泰國與緬甸。這些地緣政治區域並非同時形成，對整個結構的戰略重要性亦有所區別。華北平原與黃土高原是最早發展的地區，其次則是長江中下游與四川盆地，再來則爲緊鄰華北的內外蒙古與朝鮮半島。青康藏高原與熱帶地區的雲貴、印度支那與泰緬地區至八世紀後才先後成爲地緣政治區域；日本列島則由於寬闊海洋的阻隔而始終保有獨立地緣政治區域的地位。㉝整個結構可依氣候與生產方式，大致分爲「農耕—封建」與「草原—部落」等兩大地緣戰略領域，前者主要以中國的華北、華中與華南爲主要組成，後者則包括蒙古、新疆、滿州。兩大領域交界處在遼東、朝鮮半島、內蒙古與河西走廊，這些地區的歸屬亦時有變動；青康藏高原直到元朝爲止皆屬於草原領域，明朝之後才受農耕領域支配。此外，長江流域在東晉、南北朝與南宋期間獨立爲新領域。但由時亦因沒有超強存在而不存在任何領域。

一、農耕—封建地緣戰略領域的地緣政治模式與特徵

此領域東部以平原和丘陵爲主要地形，西部與南部則較爲高山與高原，北方與西北方則以長城線做爲與草原領域的分界線。氣候大多爲季風氣候，且擁有許多大河，故以農業主要生產方式，並發展出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華北平原與關中盆地是歷史核心，長江中下游、四川從春秋時期起成爲有效領域，在南北朝後逐漸成爲精華區，其中四川盆地雖甚具成爲不一致區域的潛力，但其位置使華夏勢力易於在此扎根並實施控制，因此四川做爲有效領域的時間遠多於不一致區域。而華南、雲貴和印度支那地區，由於氣候溼熱與地形破碎，非常不利於華夏勢力的擴張，因此長期爲荒蕪地區與不一致區域。長城線周邊與隴西高原因氣候逐漸向草原過渡，生產方式爲農牧

註㉛　包括內外蒙古與新疆東北的準噶爾盆地，後者自匈奴時代起即爲蒙古地區游牧民族牧區的一部分，直到清朝時還將該地稱爲「衛拉特蒙古」或「漠西蒙古」。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年），頁 125；姚大中，前引書，頁 211~212。

註㉜　廣義上的滿州包含舊東北九省全境與熱河，但熱河與東九省西部歷史上爲匈奴、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的畜牧區；東部的溫帶季風氣候區擁有較多森林與降水，游牧雖然也是當地的烏桓、鮮卑、女眞等民族的生產方式，但粗放農業、漁獵等所佔的比重遠比西部的游牧民族爲高，而且越往東部越依賴漁獵而放棄游牧。因此本文的「滿州」並不包含如今屬於內蒙古自治區的舊東九省地區。可參考王明珂，前引書，頁 125、210~217；Owen Lattimore,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Their Tribal Divisio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and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New York: H. Fertig, 1969）, pp. 42~46.

註㉝　東亞大陸與日本之間最狹窄的對馬海峽寬約 130 公里，相較之下英吉利海峽（English Channel）僅有 34 公里寬，導致英格蘭長期被大陸國家直接或間接控制，只有更遠的愛爾蘭與蘇格蘭免於此種命運。George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illustrated ed.（London,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58）, pp. 14~138.

並行。㉞

農耕領域是西周以來，華夏文明在一千年間不斷向外擴張的結果。關中盆地的地理特徵影響了中國戰略文化基礎之一的「天下觀」的初期發展：㉟據許倬雲的推測，關中既無崇山峻嶺，亦無茂密的森林阻斷視野，舉目所及經常是一片晴朗、籠罩四野直至地平線的穹蒼，無所不在的蒼天與廣闊的大地遂在以關中爲發源地的周人心中具備最高神特性；㊱其後當周以蕞爾小國卻能一戰擊敗強敵商朝，周人又認爲其獲有商朝的族群守護神—上帝之助，上帝之所以棄殷從周是因爲殷人耽於逸樂不如周人勤勞等原因，㊲天神與上帝的觀念結合，周既承受上帝新的天命，天籠罩四野，故「普天」之下，盡可爲周王之土，「天下」觀念由是而產生，並經由西周所創立的封建體系而被往後由華夏諸國所組成的國際社會轉化爲代表「中國」的政治地理名詞。㊳凡是欲主宰整個體系者，必須在「天下」的範圍內；只有能夠統治「天下」者，才是體系內合法的統治者，而這一「天下」只有在當時已知體系的中央－中原（或後來概念更擴大的「中國」）才能承接。㊴這個最基本的「地緣政治密碼」（geopolitical code），㊵加上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的封閉性，和完整的陸塊分布與適合農業發展的自然地理，使華夏國家始終未以海上貿易富國強兵的主要手段（南宋時期除外），㊶海上交通線（Sea Line of Communication, SLOC）對華夏國家幾無戰略重要性，自然無從產生類似西方以控制

註㉞ **史記**的「貨殖列傳」記載隴西與長城沿線的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等地區，「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爲天下饒」。馬持盈，**史記今註**，第 3 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頁 3317；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60~263。

註㉟ 某些學者主張「天下觀」並不是從周朝開始發展，夏、商時期即已有雛形出現，西周只是進一步將其內涵發展地更爲成熟，請參考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燕京學報**（北京），新 13 期（2002 年 11 月），頁 15~29。

註㊱ 許倬雲，**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年），頁 101。

註㊲ 同前註，頁 97、105。

註㊳ 張其賢，「『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東吳政治學報**，第 27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190~199。

註㊴ 「天下」沒有明確的範圍，只是隨著華夏文化圈與政治勢力範圍的擴大而跟著擴大，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天下」指的是包含「中國」與「四夷」的世界範圍，而「中國」才是華夏民族眼中眞正的體系與文明核心。此外，無論是「天下」或「中國」，在古代都不是黃河華夏文明的專屬。丁士中，「中國古代天下觀與戰略文化－以兩漢及隋唐對外和戰思想爲例」，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頁 37~39。

註㊵ 地緣政治密碼是一組政府對其他國家所做的政治的與地理的戰略假設，反映出國家戰略菁英對世界秩序的觀點，並爲國家定義出利益，指出國家利益威脅的本質與所在。Peter J.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3rd ed.（Essex, England: Longman, 1993）, pp. 64, 91; John O'Loughlin ed., *Dictionary of Geopolitics*（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4）, pp. 89~90.

註㊶ 這並不是說中國古代缺乏海上貿易，也不是說東亞缺乏海上國際貿易。實際上從先秦時期起，東亞地緣政治結構中即存有海上交通線，並在唐宋時期發展成著名的「海上絲路」，爲重要的東西貿易幹線。席隆飛、楊熺、唐錫仁編，**中國科學技術史・交通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18~346。

海上交通線爲基礎的制海權戰略思想，並對開拓東亞之外的世界毫無興趣，再加上游牧民族的嚴重威脅，使得中國歷代的戰略重心始終位於東亞大陸。

本領域的戰略交通線形式爲道路與河川，但由於運輸量與效率差異甚大，戰略交通線通常以長江、黃河、淮河等三大河爲主，而這些河川的戰略價值又略遜於連接不同平行河川體系的運河系統。道路的分布經常隨政治中心的變化而改變，陸地戰略交通線通常只出現於水運尚不發達，或水路戰略交通線無法順利抵達之地，例如關中與河北之間的豫西山地與山西省的河東，由於水運難以順利連接，因此以道路連接關中與華北水陸交通路中心的洛陽。當政治中心移至洛陽、開封或北京等水路戰略交通線能迅速抵達的地區，道路的戰略價值就大爲降低，比較重要者爲水路無法抵達的重要邊防地區的道路，例如關中盆地西北通往寧夏與甘肅的「蕭關道」，與關中朝北通往鄂爾多斯的「靈州道」，二者不僅爲大絲路的一部分，而且是游牧民族由寧夏與鄂爾多斯兩方面進入關中的主要交通線，㊷控制道路的蕭關與靈州即成爲最重要的戰略要地，顧祖禹曾稱蕭關「自秦漢以來，爲華戎之大限」。㊸另一陸地國防交通線爲華北通往塞外的路線，主要有二，其一爲由洛陽正北行，經今山西中北部的太原、朔州至內蒙古河套地區的路線，其二則爲洛陽東北行，經邯鄲、北京而至遼西的路線。㊹二者爲西周以來歷代北伐的主要路線，㊺所謂的「燕雲十六州」即位居此兩路線末端，故成爲農耕領域北方最重要的戰略要地。㊻

二、草原—部落地緣戰略領域的地緣政治模式與特徵

本領域深處歐亞大陸內部，氣候以草原與沙漠爲主，只有受黃海與日本海影響的滿州，以及受到北極海影響的漠北，擁有茂密的森林與大河流。本領域的生產方式並不限於游牧，西元前 2000-1000 年開始的世界大規模氣候寒冷化造成青海東北部的河湟地區、內蒙古的鄂爾多斯地區、西遼河流域等逐漸轉爲草原，直到春秋時代才稍微

註㊷　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45~48；薛正昌，「蕭關道與固原歷代政權建置及其發展」，**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甘肅），第 1 期（1994 年），頁 64~71。蕭關道與靈州道的詳細路線和其通往關中、戎狄的道路路線，可參考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 1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175~220。

註㊸　（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2790。

註㊹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 1 卷），頁 129。

註㊺　宋朝**太平寰宇記**卷四十九引**冀州圖經**記載：「自周、秦、漢、魏以來，前後出師北伐，唯有三道：中道正北發太原，經雁門、馬邑、雲中，出五原塞，直向龍城，即匈奴單于十月大會祭天之所。一道東北發向中山，經北平、漁陽，向白檀、遼西，歷平岡，出盧龍塞，直向匈奴左地，即左賢王所理之處。一道西北發自隴西，經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歷伊吾塞，向匈奴右地，即右賢王所理之處」。史子正，**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年），頁 401。

註㊻　前述北伐路線中的雲中即燕雲十六州的雲州，雁門關亦位於燕雲西部，馬邑則位於燕雲十六州中的朔州。另北平屬幽州，漁陽則屬檀州與薊州，盧龍塞即今喜峰口，位於燕雲東部。

回暖，再度使部分上述地區適合農業發展，㊼因此本領域在氣候適合之處亦能發展農業，特別是滿州冬季森林中狩獵與夏秋兩季的農業收穫是該區游牧民族的重要輔助生產方式。㊽塔里木盆地則因塔里木河而產生可供精細農業發展的綠洲，㊾除此之外大多數地區皆以游牧爲主。游牧無法發展出嚴格中央集權甚至封建式政治制度，只有部落、部落聯盟，所謂的游牧帝國也只是以分配牧場與其他牧民無法自產的必要生活資源爲主要功能的「超部落國家」。㊿僅當游牧民族控制了農耕地區並將政治核心置於該區後才會向中央集權帝國政治制度轉變，例如北魏、遼、西夏、金、元、清。

王明珂曾指出理想的牧區包含三個條件：一、足以在不同季節皆可提供牧畜所需的水草資源的廣大草原；二、有森林的山區，提供牧民獵場與製作車具、穹廬、弓矢的木材，且能在夏、冬季節得到豐富的水源、草料及避風寒的場所；三、鄰近定居村鎮、半游牧聚落或重要貿易路線的地理位置，以取得自己無法生產製造的日常用品或穀類，或由保護定居城邦及商旅中獲利。51符合上述三個條件的地區爲本領域的精華區與有效領域，包括內蒙古南部的鄂爾多斯地區，涵蓋河套、陰山、鄂爾多斯高原（漢代文獻稱此地爲「河南」）與寧夏的銀川、固原地區，與華北的半農半牧區緊鄰；蒙古高原西北部鄂爾渾河流域（漠北）與阿爾泰山南方的準噶爾盆地，與大絲路的天山北路諸國相鄰；內蒙古西部的額濟納旗與阿拉善右旗，以及新疆東部的蒲類海，居河西走廊的農業區與大絲路之旁；青海高原東北部的河湟地區，特別是日月山以東的湟水流域，屬黃土高原的西部延伸以及黃河上游，鄰近甘肅西部的半農半牧區；最後是西遼河流域，擁有大興安嶺森林，可供游牧、狩獵與簡單農作，並靠近遼東半島、遼西走廊與燕雲十六州等地。52此外，塔里木盆地是草原領域中農業、礦產與手工業最豐富的地區，長期與蒙古高原東部的克魯倫河流域－呼倫貝爾草原地區一起做爲有效領域。53

註㊼ 關於北亞與中國西北部的游牧化，歷來國外與兩岸學者已有許多研究，本文主要參考林澐，「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燕京學報**（北京），新 14 期（2003 年 5 月），頁 95~146；王明珂，前引書，頁 90~91；許倬雲，前引書，頁 68~69；劉昭民，**中國歷史上之氣候變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頁 31~73。**史記**的「匈奴列傳」也記載，周人祖先公劉因爲「失其稷官」，只好「變爲西戎」，很明顯是因爲氣候變遷才會導致原來以農業爲主要生產方式的民族改爲游牧業，見馬持盈，**史記今註**，頁 2898。

註㊽ 王明珂，前引書，頁 213~217。

註㊾ 姚大中，前引書，頁 215~216。

註㊿ 關於興起於蒙古高原的游牧帝國的政治制度研究與評析甚多，本文主要參考吳景山，「後突厥汗國的政治制度辨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甘肅），第 4 期（1995 年），頁 38~41、56；王明珂，前引書，頁 155~166、246~250；林幹，**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通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109~115、119~130；劉學銚，**北亞游牧民族雙軌政制**（臺北：南天書局，1999 年），頁 147~178。

註51 王明珂，前引書，頁 124。

註52 整理自王明珂，前引書，頁 124~125、168~169、209、213~217；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1.

註53 例如匈奴在強盛時便曾設置「僮僕都尉」以控制塔里木盆地地區的政治與經濟物產。而呼倫貝爾地區則屬匈奴左賢王管理，在蒙古帝國時代則屬於成吉思汗兄弟等「東道諸王」的領地。姚大中，前引書，頁 218~222、223~224、227。

鄂爾多斯與漠北爲本領域的歷史核心，而西域則是最重要的有效領域，連接此三個區域的絲路爲本領域的戰略交通線，共分爲兩部分：「草原絲路」－唐朝時的「中受降城入回鶻道」或「參天可汗道」，以及元朝時的「木怜站道」，由陰山穿越戈壁向北連接漠北與鄂爾多斯，從匈奴時期起即爲各游牧帝國主要的貿易幹道，以及與農耕帝國交戰時雙方的行軍交通線；㊹草原絲路在漠北分南北兩道－南道向西南行三千里至準噶爾南部的庭州，㊺北段則由漠北越過蒙古高原至阿爾泰山北麓的草原，再經中亞至裡海、伏爾加河甚至（東）羅馬帝國東部等地區，是匈奴以來的傳統交通線與最早出現的絲路，南道則因突厥藉由參天可汗道連結中亞與中國才眞正成爲戰略交通線。南北朝與中唐之後則先後因佔據青海的吐谷渾與吐蕃的開發，而以西域南道經青海、甘肅南部至關中與四川的「青海路」(即南北朝的河南道）爲主要絲路幹線。㊻另外連接甘州（今張掖市）與漠北的草原交通線從漢代起亦做爲漠北通往河西走廊的重要交通線。㊼任何游牧帝國欲成爲結構中的極，必須藉由佔有鄂爾多斯、漠北、西域三處中的任兩處以控制草原絲路來達成。㊽最後，本領域亦有兩個戰略要地，最重要的是同時包含河套農業區與草原沙漠區的鄂爾多斯，是農耕帝國與游牧帝國的前線基地與兩大領域間的聚合區，始終是二者的必爭之地。㊾其次則爲準噶爾盆地進出塔里木盆地的門戶、天山南北路匯聚點的吐魯番盆地，此地不僅爲控制絲路的最重要地區，亦可分別經由河西走廊與草原絲路進入關中與漠北。

肆、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對中國大戰略之影響

一、西周

此時的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範圍僅由黃土高原與華北平原構成。關中的「宗周」是西周的政治核心與精華區，唯一的戰略交通線則是從宗周沿渭水與黃河南岸東至舊殷商軍事重鎮管邑（今鄭州)，而位於其上的雒邑（洛陽）則是華北平原道路交通線中心：由該地東出虎牢、滎陽，即到達豫東平原邊緣；北渡孟津，則進入黃土高原另一經濟區河東，還能沿太行山麓、黃河北岸抵達原商朝首都朝歌所在的河內，南下伊

註㊹　鍾美珠譯，長澤和俊著，**絲綢之路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267；而**太平寰宇記**記載的農業帝國北伐三道，中道的五原塞即位於河套地區，戰國至秦漢的雲中郡亦位於河套；李明偉，**隋唐絲綢之路—中世紀的中國西北社會與文明**（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90~91。另外，元朝時在木怜站道之外尚有一條連接大都、上都（即忽必烈自立爲汗的開平）與漠北，同樣跨越戈壁的「帖里干站道」存在。兩路線的詳細路徑請見席隆飛、楊熺、唐錫仁編，**中國科學技術史・交通卷**，頁 633~634。

註㊺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頁 1170~1172。

註㊻　李明偉，前引書，頁 81~83、90、102~104；姚大中，前引書，頁 75。

註㊼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 2 卷），頁 618~628。

註㊽　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p. 62.

註㊾　*Ibid*., pp. 61~71.

闕，穿過南陽盆地，則進入南方主要民族荊楚盤據的漢水流域；雒邑也位於經函谷至姚林，穿越險要崤函山區道路的東口。⑥⓪周王以強大的兵力（「成八師」，宗周的直屬軍隊稱爲「西六師」）駐守於雒邑，並沿黃河—太行山之間分封諸侯國以強化對雒邑以東的戰略交通線之控制：齊、魯在山東壓制殷商舊勢力，宋國在淮河中游對抗徐夷，申國在南陽控制方城和通往宗周的主要道路丹水谷地以阻止荊蠻北上。⑥①另外與犬戎保持同盟關係以控制蕭關道。西周初期與中期的結構因而爲霸權，周公東征與成王、康王的封建，都是以武裝殖民爲主要手段的攻勢／擴張大戰略。⑥②

然而由於當時體系的互動能力太低，周王對遠離宗周的封國只有鬆散的政治控制，故對戰略交通線的控制並不穩固，加上從關中至黃淮平原需時甚久，黃淮平原的殷商舊勢力、徐夷以及荊蠻均可在宗周主力到達前嚴重威脅雒邑與戰略交通線的安全，使得西周的霸權地位極不穩固。西周爲了穩固對戰略交通線的控制而採行攻勢／擴張大戰略：成王、康王、昭王、穆王都進行東征、南巡與北伐，大舉向東方與南方進攻，以進一步擴大周人對華北平原的控制，甚至打通關中與南方金屬產地的運輸路線。⑥③此外，西周逐漸在文化與政治上產生鄙棄犬戎的心理，導致穆王爲了獲得對蕭關道的絕對控制以全心投注東方戰事，首次打破同盟關係主動攻擊犬戎，直接導致後來西周與犬戎、玁狁之間的戰爭。攻勢／擴張大戰略延續到周宣王，被視爲安撫型大戰略代表的「畿服制度」，大致上僅在穆王之前曾對所有結構中的主要行爲者施行，以後則只限於周朝的封建諸侯。

結構範圍在春秋戰國時代擴大至長江流域與內蒙古，主要的政治中心爲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與山西，精華區初期限於黃淮平原，關中的政經地位直到戰國中期秦國崛起後才恢復。春秋戰國時代的力量中心極爲分散，但除了春秋初期的鄭國與東周王室，以及戰國初期的魏國和韓國，皆位於結構的邊緣。力量中心的分散使新戰略交通線與要地開始出現，春秋時代的南北戰略交通線由楚國經雒邑、鄭國與宋國至齊國、晉國及河北；東西戰略交通線則主要由晉國的山西跨太行山，經衛國與鄭國至齊國，和楚國至長江下游的吳國與越國的交通線，⑥④位於東西與南北戰略交通線交會的鄭、宋、陳三國遂成爲最重要的衢地。而春秋後期由吳國開鑿的邗溝與荷水起，包括後來主要由魏國所開鑿的鴻溝運河系統，形成連接長江下游、淮河、黃河與濟水之間

註⑥⓪ 宋杰，**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7。另外李峰也指出，從洛陽至朝歌的交通線是殷周時期途經中國東部人口最稠密地區的一條最重要交通線，見李峰，前引書，頁 73~74。

註⑥① 史念海，「春秋以前的道路」，史念海主編，**河山集・七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14~119。

註⑥② 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2 年），頁 333~351。

註⑥③ 許倬雲，前引書，頁 180。

註⑥④ 關於春秋戰國時期主要陸地交通線的分布，本文主要參考陳彥良，「戰國迄漢初區域交通和市場網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5 年 12 月），頁 5~7；史念海，「春秋以前的道路」，頁 120~131；史念海，「戰國時期的交通道路」，史念海主編，**河山集・七集**，頁 134~154。

的人工運河系統，成爲最主要的戰略交通線。⑮水陸交通線主要匯聚於鄭國（被韓國併吞後其交通區位優勢即爲韓國承接）、宋國、衛國與魏國，宋國境內因處於鴻溝系統中心而繁榮的戰國第一大商業都會陶則是戰國時期最主要的交通線集散中心，⑯方城、蕭關、豫西山地的函谷關與武關，以及太行八陘和陶，都是主要戰略要地。⑰

本時期戰略交通線匯集於中小國家，大國反而位居結構邊緣，遂使春秋初期與戰國時代出現無極結構。不過春秋中期之前由於各國能力差距並不明顯，直接控制並非主要方式，多採取外交聯盟的間接控制，但隨著春秋晚期大國併滅小國趨勢的增強，各國能力差距擴大使直接控制成爲主要方式。強國爲了爭奪戰略交通線的控制權而四處擴張。爲了獲得更多支撐擴張的資源，華夏國家將異族視爲重要的人力與物力資源，是擴張的首要目標之一，⑱主要國家無不大肆對其發動侵略，結果導致戰國中期以後散居中原的異族幾乎全部消失，只有白狄建立的中山國還存活，而秦、趙、燕、楚等國還不斷地向邊境外異族發動進攻。⑲戰國時期華夏主要國家的大戰略均爲明顯的攻勢／擴張型，其達至顛峰的結果就是秦滅六國，將結構重新導向霸權。但是秦朝成爲霸權後仍持續向周邊地區擴張，進一步使結構範圍擴張至華南、雲貴與印度支那中北部。⑳秦朝的領土邊界相當具有地緣政治意義，標示了華夏農業文明的四方界線：長城線與高山、高原爲農耕與游牧文明的界線，而南方的熱帶氣候與雲貴高原、中南半島北方崎嶇的地形則阻止華夏勢力南向擴張，並始終困擾往後中國歷代王朝在此區的軍事行動。㉑

二、兩漢

西漢是農耕與游牧文明正式產生高度互動的開始。周朝時散居於中原內的戎狄並

註⑮　楊寬，**戰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64~69；陳彥良，「戰國迄漢初區域交通和市場網絡」，頁 7~16；史念海，「戰國時期的交通道路」，頁 161~164。

註⑯　史念海，「戰國時期的交通道路」，頁 155~161。

註⑰　同前註，頁 164~166。

註⑱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mpir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22~124.

註⑲　**左傳**、**戰國策**、**史記**等重要古代中國歷史文獻皆記載了春秋戰國時期秦國、晉國、趙國、燕國分別攻擊義渠、林胡、樓煩、東胡、中山、休溷諸貉等部族與國家，併吞其地之後在該地設郡縣，完全視其爲領土的一部分，而非完全軍事化的「邊鎮」。這顯示春秋、戰國、秦漢時代中原文明對異族的壓力並不像後代那樣恐懼。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各國和周邊異族的征戰關係請見楊寬，**戰國史**，頁 283、286~289、354、365~367、394。

註⑳　秦朝究竟是否已將越南中北部納爲領土，目前是一個有爭議的歷史議題，以往認爲秦朝已領有越南中、北部地區，但有學者主張秦朝領土只及於今廣東與廣西地區，並未眞正進入越南，請參考張榮芳、黃淼章，**南越國史**，第 2 版（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83~84。

註㉑　倪樂雄，**尋找敵人：戰爭文化與國際軍事問題透視**（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 年），頁 303~304；丁力，**地緣大戰略：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及其戰略選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222~229。

非眞正的游牧民族，⑫眞正的游牧民族在西漢之前並未與華夏國家產生密切互動，彼此的大規模北伐與南侵都只是短期的衝突。游牧民族從西漢起正式以支配草原領域的姿態成爲東亞地緣政治結構中的主要行爲者，開啓爾後華夏國家與游牧民族爭鬥的循環，中國從此只是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的一部分，不能再以其分裂或統一作爲結構形式的依據。

西漢的政治中心與精華區同時位於關中，⑬匈奴則位於鄂爾多斯，且因佔有河西走廊而可同時從蕭關道與靈州道對關中發動攻擊，故西漢對匈奴的威脅相當敏感。白登之戰使西漢初期君臣樹立無法戰勝匈奴的認知，⑭被迫接受對西漢國家安全極爲不利的兩極結構－雙方雖以秦朝長城爲界，但匈奴實際上據有鄂爾多斯。而西漢初期尚有半獨立的異姓功臣諸侯王與宗室王國對中央的忠誠問題，二者同爲西漢棘手的國家安全議題，在這種情況下西漢中央選擇優先強化內部控制，對外採取和親與朝貢的安撫型大戰略，⑮但兩極結構的壓力在西漢穩固中央集權後被凸顯出來，漢武帝遂改採攻勢／擴張大戰略意圖徹底解決匈奴的威脅，其戰略方向首先集中於鄂爾多斯，但並不因重新奪得鄂爾多斯而停止，反而將長城更向北深入草原與向西伸入河西走廊，⑯且在長城周邊設置與內地相同的郡縣制度。最後，西漢在減輕來自匈奴的威脅之後，即將擴張目標轉移至朝鮮半島、雲貴與華南地區，併吞南越、閩越、衛氏朝鮮等國。「若無侵小，何以至焉」，⑰武力是西漢大戰略的主要工具，「文德」僅爲文飾而已。⑱匈奴在漢宣帝時遭徹底擊敗，完全失去對草原戰略交通線的控制且無法對西漢產生危害，結構成爲西漢沒有任何威脅的霸權結構，使其大戰略開始朝安撫型轉變，和親又成爲戰略手段之一，但此時已不再被視爲屈辱的象徵，而是戰略優勢地位下的安撫手段。

東漢的地緣政治結構異於西漢，其政治中心與精華區同時東移至洛陽與黃淮平

註⑫ 商、周時期中國北方民族並不完全依靠游牧爲生，眞正屬於游牧的民族爲長期屬於嚴重邊患的鬼方、玁狁，而周朝時期在中國北方與周人雜居的戎、狄等族則非完全的游牧民族，因爲中國北方的氣候環境比鬼方、玁狁等居住的內蒙古草原要好上許多，使他們除了游牧之外還能夠從事農作與漁獵，不過基本上他們在生產方式、政治制度與民族文化上還是與華夏文化中純粹的農業性格截然不同。可參考杜正勝，前引書，頁 499~500；王明珂，前引書，頁 93~98。

註⑬ **史記**「貨殖列傳」中稱「關中之地…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馬持盈，**史記今註**，頁 3317。

註⑭ **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呂后時大臣討論是否要對匈奴改爲武力應對時，諸將皆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遂仍與匈奴和親。馬持盈，**史記今註**，頁 2910~2911。

註⑮ 西漢亦曾嘗試採取防禦型大戰略來應付外部威脅，**漢書**「匈奴傳下」就記載「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楊家駱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第 5 版（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頁 3831。

註⑯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81~212。

註⑰ 語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國大夫子產描述爲何晉國在春秋中期之後領土竟比西周王畿還大上數倍的原因。王雲五編，李宗侗註譯，葉慶炳校訂，**春秋左傳今註今譯**，校訂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頁 943~944。

註⑱ 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頁 35。

原，故對游牧民族的威脅不若西漢敏感。較強大且未臣服於東漢的北匈奴在東漢初期未能控制草原絲路，此種單極結構使東漢初期的大戰略偏向安撫型。但由於西域諸國互相攻伐導致北匈奴乘東漢放棄西域的機會趁虛而入，⑲重新恢復對草原絲路的控制而使結構再度成爲兩極，然而北匈奴同時又遭受嚴重天災而不斷有人民叛逃南匈奴，導致原來力量差距懸殊的南北兩部逐漸縮短差距，使南匈奴興起統一匈奴的想法，要求東漢支援其統一，徹底消除北匈奴對東漢的威脅。⑳東漢的大戰略在避免北匈奴藉由控制西域而壓迫河西走廊的基本思維下開始轉趨積極，攻勢／擴張傾向逐漸抬頭，結果便是長達 18 年（73-91 年）的戰爭，最後恢復對西域的控制與徹底消滅北匈奴在結構中的勢力，結構形式又轉爲對東漢毫無威脅的霸權，其大戰略才再度成爲防禦型與安撫型。

三、魏晉南北朝

草原地區自東漢中期直到五世紀初柔然崛起之前未出現超強，失去對歷史的影響力。農耕領域自東漢末年開始分裂，各王朝大戰略的主要目標均在領域內，只有曹魏、西晉、前涼、北魏曾向河西與西域發展，㉑北魏雖屢次與柔然交戰卻從未在草原擴張領土，反而在長城與內地之間配置純軍事性的「六鎮」防衛體系，與西漢的攻勢長城截然不同；長城從北齊起也逐漸從北魏時期的位置往南移動。㉒至於東晉與劉宋雖和鄰近交州的林邑國（越南南部）交戰，但同樣只是防禦性目的。㉓長江在東晉時成爲新戰略交通線，連接四川與長江中游的精華區和下游的政治中心。北朝的政治中心與精華區大多位於華北平原，淮河流域重要渡口的壽春，和位於漢水北岸、控制南陽盆地通往長江中游的襄陽遂成爲結構中最重要的戰略要地。下文分別描述本時期的結構對各國大戰略的影響。

（一）三國

本時期延續東漢末年的割據局勢，大多數戰爭均與戰略要地的爭奪密切相關。三國實爲單極結構，長江在當時並非戰略交通線，眞正的戰略交通線是華北平原與長

註⑲　東漢對西域的基本態度是放棄，**後漢書**「西域傳」記載，漢光武帝初年西域諸國「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其後當西域諸國請求東漢援助他們對抗莎車國統一全西域的野心時，漢光武帝卻說「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在東漢中期之後則認爲維持對西域的控制對其本身並無實質利益，因此產生「三絕三通」的現象。世界書局編輯部編，**新校後漢書注**，第 3 版（臺北：世界書局，1974 年），頁 2909、2912、2924。

註⑳　**後漢書**「南匈奴傳」記載東漢大臣耿秉主張同意南匈奴請求的原因：「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同前註，頁 2952~2953。

註㉑　鍾美珠譯，長澤和俊著，前引書，頁 71~121。

註㉒　姚大中，前引書，頁 50~52。

註㉓　周偉洲，「公元三至六世紀的南海諸國及其與中國南方諸政權之關係」，**燕京學報**（北京），新 10 期（2001 年 5 月），頁 116~118。

江、淮河流域之間的鴻溝運河系統，其經由巢肥運河可由巢湖、濡須水入長江，順江直下即抵東吳首都建業與經濟中心三吳，[84]在巢湖以上均爲曹魏所控制，因此東吳與蜀漢只是力量中心。不過蜀漢從漢中盆地威脅曹魏的關中；曹魏雖從襄陽、合肥、壽春嚴重威脅東吳的荊州與首都建業，但東吳在濡須、巢湖口的東興有效遏制了曹魏的進攻路線。[85]結果使曹魏大戰略以防禦型爲主，因其在東西兩處皆難以發動進攻，反而東吳與蜀漢多次主動攻擊曹魏，大戰略皆屬攻勢／擴張型。曹魏只有在後期因奪得漢中才進一步滅蜀，滅蜀則給予後繼的西晉滅吳統一整個農耕領域的契機。

（二）東晉與五胡十六國

鴻溝、巢肥運河、巢湖、濡須水仍爲戰略交通線，長江流域由於東吳以來的開發與北方居民大量南遷而出現荊州與四川兩大精華區，使長江成爲新戰略交通線，結構在大多數時期爲東晉控制長江流域的單極，只短暫（370-383 年）出現東晉與前秦對峙的兩極結構。東晉的北伐顯示其有意採用攻勢／擴張大戰略，但因內部政治鬥爭嚴重而未果。

（三）南北朝

此階段的結構變化極爲快速。柔然、東晉、劉宋、蕭齊與北魏之間曾形成三極結構（約 400-485 年），直到 485 年後因爲控制準噶爾的高車反叛柔然，才轉爲北魏與蕭齊／蕭梁對峙的兩極結構。爾後卻因北魏在西元 534 年分裂，蕭梁衰弱分遭西魏、北齊奪去四川與淮南，以及突厥取代柔然而形成無極結構，直到北周滅北齊（577 年）後才形成北周－突厥兩極結構，但 583 年突厥又因爲隋的離間而分爲東西二部並臣服於隋而轉爲單極。南北朝初期的戰事多因對淮河流域的爭奪、以及北魏欲消除柔然的威脅而起，其後北魏雖從劉宋奪取淮河流域而擁有戰略優勢，但因忙於漢化而使大戰略暫時轉向安撫型；北魏在 534 年分裂爲東魏／北齊、西魏／北周，二者均希望消滅對方，但也不忘繼續從較爲弱小的南朝奪取土地，大戰略皆爲攻勢／擴張。南朝在失去淮河流域後只能以防禦型大戰略爲主，梁武帝雖想趁北魏內亂北伐，但也只是爲了收復淮河的攻勢防禦，南朝因侯景之亂而衰退後更只能依賴防禦型大戰略，但值得注意的是，南朝曾爲了獲得更多對抗北朝的人力與物力資源而同時在華南、印度支那地區進行將異族作爲資源來源的戰爭。[86]

四、隋唐

隋唐時農耕地區恢復統一的帝國結構，關中再度成爲政治中心，但精華區完全轉

註[84] 宋杰，前引書，頁 245~246。

註[85] （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頁 1282~1283。

註[86] 周偉洲，「公元三至六世紀的南海諸國及其與中國南方諸政權之關係」，頁 111~113。

移至華北平原、四川與長江中下游，[87]因此隋朝再度開鑿南北運河系統，成爲領域中最重要的戰略交通線；草原地區則有突厥、回鶻、吐蕃代嬗，因此隋唐時期的結構形式變化極大：隋初至唐初（589-620 年）爲單極；唐滅兩突厥與高昌後至安史之亂（755-763 年）爲霸權；安史之亂後逐漸發展爲唐、回鶻、吐蕃鼎立的三極；850 年吐蕃與回鶻相繼敗亡後成爲唐朝僅存的單極，但此時的唐朝已陷於嚴重的藩鎮割據，中央無力控制內部的戰略交通線，迅速朝五代十國的無極發展。此外，結構中還存有其他力量中心存在：日本、雲貴地區的南詔、朝鮮半島的高句麗與新羅，以及滿州中北部的渤海國（或稱北詔）。

隋初並未控制西域與南北朝以來東西貿易主要幹線的河南道，而高句麗不僅不願臣服於隋，亦與東突厥有軍事聯盟，單極結構無法滿足隋朝對領土、政治與經濟的需求，導致其大戰略即使在統一中國後亦爲積極的攻勢／擴張型：四征高句麗（598、612-614 年）；爲了控制絲路而進攻吐谷渾，並拓展疆土至青海北部與西域東部（608-609 年）以作爲與貿易基地。[88]但隋末的動亂則使結構發生變化：隋末包括李淵在內的不少割據勢力向突厥稱臣，甚至引突厥攻擊對手，結果使突厥重新控制絲路與長城。唐初爲了穩固帝國結構而採用安撫型大戰略，和親是主要戰略手段並幾乎擴及整個唐代，這與唐朝皇室的鮮卑血統與深刻胡化不無關連。[89]但安撫型大戰略始終不能解決東突厥的威脅，加上唐朝國力上升（628 年討平割據鄂爾多斯的梁師都，正式統一），與東突厥遭逢天災與內亂，自變數與中介變數一起使唐朝大戰略轉爲攻勢／擴張。但唐朝滅東突厥後雖建立起以唐朝爲中心的新東亞國際政治秩序，卻未使唐朝大戰略變爲防禦型或安撫型，因爲唐朝開始直接與西突厥及其屬國接壤，雙方圍繞控制絲路的貿易控制權而爆發戰事，唐朝征服高昌（640 年）與西突厥（657 年）後於其地設立安西都護府總管天山南北路，盡有蒙古高原及西域全境並完全控制草原絲路與大絲路，結構成爲霸權。

但唐朝的霸權結構中仍有高句麗、吐蕃、渤海、新羅、後突厥、南詔等未必服從唐朝的強國，這使得唐朝大戰略一直保持攻勢／擴張傾向：645-668 年三征高句麗；670-676 年與新羅爲了朝鮮半島領土問題而開戰。但最重要的是唐蕃戰爭，位於青康藏高原的吐蕃在 670 年併吞吐谷渾而直接與唐接壤，並進入青海與西域與唐爭奪大絲路

註 [87]　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頁 88~110。

註 [88]　**隋書**卷 67，「裴矩條」記載「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併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帝複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國…帝將巡河右，複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啖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儛喧噪。複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塡咽，周亙數十裡，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唐）魏徵等撰，**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 年），頁 1580~1581。

註 [89]　劉學銚，**五胡興華：形塑中國歷史的異族**（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4 年），頁 85~87；趙文潤，「論唐文化的胡化傾向」，**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陝西），第 23 卷第 4 期（1994 年 12 月），頁 35~41。

控制權、雲貴地區的領土和鹽鐵之利。⑩唐朝雖在 683-712 年因內部政治鬥爭而無法積極對外，且迫於後突厥的壓力而不得不撤出漠北，在 708 年修建三座「受降城」以確保河套安全，但仍在 690 年重新奪回被吐蕃攻陷的重要大絲路控制據點「安西四鎮」，⑪並成立「北庭都護府」(702 年) 以控制天山北路。⑫唐玄宗更恢復完全的攻勢／擴張大戰略，不僅在西域的聲勢壓倒吐蕃與大食達到鼎盛，⑬同時對雲南亦加緊控制。⑭然而唐朝控制雲南的行動反過來招致南詔與唐朝敵對並使南詔投向吐蕃，⑮唐、南詔、吐蕃在 752-754 年發生戰爭，⑯唐朝卻因雲貴的自然條件與民族差異，此後也一直受制於此，⑰從此喪失在雲貴的優勢地位，**新唐書**因此認爲南詔叛唐是唐朝滅亡的遠因。⑱

唐朝從漠北撤出成爲回鶻興起與結構改變的契機，加上吐蕃在 790 與 792 年先後攻陷北庭與安西都護府控制大絲路，結構遂成爲三極，但唐朝大戰略卻明顯轉爲防禦型與安撫型，其主要原因在於帝國的地緣政治模式出現巨變：首先，華北平原的「河朔三鎮」等藩鎮在安史之亂後實質上獨立與反叛，⑲使得河北精華區無法再提供唐朝經濟與軍事所需，「雖號稱一朝，實成爲二國」，⑳導致唐朝軍事力量衰退。㉑長江中下游精華區則因靠近開封周邊運河的淮西、淄青兩大藩鎮的敵對態度，使唐朝必須時常注意其潛在威脅，不得不依賴中原藩鎮，實行「以方鎮御方鎮」的戰略，雖然消滅了淄青與淮西，並使河朔三鎮不敢發動叛亂，但中原藩鎮也成爲尾大不掉的遺患，㉒重兵

註⑩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42~55、68~88；王吉林，**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新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頁 125~137、158~165。

註⑪ **新唐書**記載武周內部爭論是否要收復被吐蕃奪去的安西四鎮，右史崔融獻議稱「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憺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裏，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庭、安西諸蕃悉亡」，於是武周決定與吐蕃力爭安西四鎮。（宋）歐陽修、宋祈同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頁 6078~6079。

註⑫ 同前註，頁 1047。

註⑬ 王小甫，前引書，頁 132~186。

註⑭ 王吉林，前引書，頁 165~172。

註⑮ 同前註，頁 187~189。

註⑯ 同前註，頁 191~196。

註⑰ 同前註，頁 208、210。

註⑱ **新唐書**評論唐朝與南詔的關係稱：「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請見（宋）歐陽修、宋祈同撰，**新唐書**，頁 6295。

註⑲ 「河朔三鎮」，語出兩**唐書**，指盧龍、成德、魏博等華北平原三大藩鎮，安祿山即以盧龍節度使身分發動叛變。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未直接攻入只有收撫，因此三鎮在安史之亂後賦稅不入唐朝，節度使也由地方自行擁立，更有自己的一套官制，完全不受唐朝中央節制，唐文宗時的宰相牛僧孺稱「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杜牧也說「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楊家駱編，**新校資治通鑑注**，第 4 版（臺北：世界書局，1972 年），頁 7874、7887。

註⑳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 2 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頁 28。

註㉑ **資治通鑑**引用杜牧所撰「戰論」一文稱「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楊家駱編，**新校資治通鑑注**，頁 7889。

註㉒ 根據張國剛的統計，唐朝中原藩鎮的動亂共計 52 起，僅次於河朔藩鎮。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50~53。

長期集結中原又使唐朝無力對外發展。⑯此外，吐蕃趁安史之亂進攻隴右道與關內道等唐朝的馬匹產地，⑰並在 764-776 年攻佔整個河西走廊，迫使唐朝的西北防線收縮到蕭關周邊，必須積極防止吐蕃對長安的嚴重威脅，還必須同時注意對東南水運戰略交通線的控制，因此只能以戰略防禦應對吐蕃的威脅，另以安撫型大戰略與吐蕃在西域最大競爭對手回鶻交往。雖在 849 年收復河湟，但這是該地吐蕃官吏趁吐蕃衰亂而回歸唐朝的舉動，非唐朝自身武力所致。⑱回鶻、吐蕃相繼衰亡後，唐朝仍深陷藩鎮割據、黃巢之亂等內亂，實際上已不再是眞正統一的帝國。

五、兩宋

北宋初年面臨結構在唐末以來的巨變：首先，華北因長期戰亂而徹底失去精華區的地位，不得不將首都更往東移至位於連接黃河與長江的汴渠（通濟渠）之旁、又能迅速通往河北、山東地區的開封。⑲其次，燕雲十六州被後晉割讓給契丹，使得北方國防戰略要地落入游牧帝國之手，後者正式取得完全的農耕地區，改變了兩者的互動模式，衝突不再完全肇因於傳統貿易關係；⑳第三、吐蕃不僅切斷大絲路與中國的聯繫，亦使河西走廊遭回鶻、吐蕃、羌等游牧部落佔據，脫離農耕領域的支配，草原絲路取代大絲路而更加繁榮，後者直到西夏崛起後才再度恢復，但因華北衰退與西夏、北宋、遼、金、元之間的政治關係與政治中心變化而不再進入關中，改經鄂爾多斯進入滿州或燕京（今北京），並沿用至元朝。㉑第四、草原領域的政治中心轉移至滿州，蒙古高原失去原有的地位，但遼與政治中心更偏東的金亦始終很難控制漠北，無法完全支配整個草原領域。㉒因此在 1004 年之前，結構形式由五代的無極朝北宋初年的單極發展，1004 年之後才因遼於漠北建立三個「鎮州」控制草原絲路而進入兩極，㉓西夏臣服於遼則使絲路交通間接受遼所控制，更強化遼在兩極結構中對北宋的戰略優勢。金與南宋時期的結構則因南宋控制長江，金控制黃河而爲兩極，草原地區直到蒙

註⑯　杜牧「戰亂」稱「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他使」。楊家駱編，**新校資治通鑑注**，頁 7889。

註⑰　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頁 264~266。

註⑱　陳寅恪，前引書，頁 149。

註⑲　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頁 319~320。

註⑳　契丹由於佔領燕雲十六州、遼東等農業地區，以及大量漢人在唐末五代避居滿州的影響，其經濟類型已爲農牧並重，但可能因爲仍無法供應本身所需，故重視宋遼貿易，特別是貴族對北宋奢侈品之依賴，日本學者田村實造因此認爲澶淵之盟就是遼爲逼迫北宋結束貿易制裁、使兩國貿易關係正常化而發動的，陶晉生認爲這是沒有實際證據支持的合理推測。西夏經濟類型亦爲農牧並行，不過比較仰賴畜牧，因此特別重視商業來補充其不足，李華瑞由此發現宋夏衝突經常發生在北宋對西夏實施貿易制裁之後。請參考李華瑞，**宋夏關係史**（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328~342；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年），頁 53~56。

註㉑　鍾美珠譯，長澤和俊著，前引書，頁 262~271、401~403。

註㉒　同前註，頁 324~336。

註㉓　同前註，頁 336~339。

古帝國在 1206 年興起後才恢復領域地位。

結構變化使北宋戰略重心由西北轉移至東北，且在單極結構中爲了修正對其不利的領土安排而表現出強烈的攻勢／擴張傾向：首先，爲了奪回燕雲十六州而連續兩次（979 與 986 年）北伐，並注意到遼難以控制漠北與西域，在 981 年遣至漠北與西域，希望連結西域諸國以及漠北韃靼部落對遼夾擊，助北宋奪回燕雲十六州。⑪其次，在 980 年試圖以武力將藩屬國交趾再度收爲版圖。⑫最後，宋太宗對西北邊藩採取削藩政策，意欲以此直接統治當地，⑬結果導致西夏前身的夏州政權與北宋決裂，開始雙方長期戰爭的第一階段。986 年北伐的再度慘敗迫使北宋不得不將大戰略轉爲防禦型與安撫型並用，而 1005 年的宋遼澶淵之盟與宋夏景德和約，以及對宋軍執行攻勢作戰極爲不利的鄂爾多斯沙漠化現象，都不斷加深北宋大戰略中的戰略防禦與安撫型傾向。⑭但結構在此後出現三種影響北宋大戰略的地緣政治發展：

第一、完全控制河西走廊的西夏在 1038 年正式脫離與北宋的臣屬關係，成爲結構中獨立的力量中心。第二、北宋仍對領土現狀感到不滿，特別是與西夏間存在嚴重的劃界衝突，⑮後者不斷進攻青海河湟地區的青唐吐蕃，位於青海路的青唐不僅是西夏獨立後北宋與西域往來的交通要道，又阻止西夏由河湟進入甘肅南部，是北宋重要的藩屬，西夏對青唐的攻勢促成日後北宋的開拓熙河。⑯第三、北宋在 1044 年發展出「聯麗制遼」聯盟戰略，意圖連結高麗牽制遼的動向，雖然最後沒有實施，⑰但反而刺激了遼在 1050 年之後與青唐密切交往，北宋的熙河開拓亦使青唐感受到威脅，因此

註⑪ 張睿麗，「王延德出使高昌使命補證」，**西域研究**（新疆），第 3 期（2003 年），頁 39~44。

註⑫ 據**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記載，北宋知邕州侯仁寶上疏宋太宗「交州主帥被害，其國亂，可以偏師取之」，宋太宗「大喜」而準備召仁寶謀畫，宰相盧多遜甚至建議：「交阯內擾，此天亡之秋也，朝廷出其不意，用兵襲擊，所謂疾雷不及掩耳」。這個意見立刻得到宋太宗的採納。請見（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第 4 版（臺北：世界書局，1983 年），頁 245。湯佩津也引用**安南志略**與**大越史記全書**的資料來源，證明宋太宗伐交趾的原因明顯就是想將其收爲宋朝領土。湯佩津，「北宋的南邊政策：以交趾爲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年），頁 57；王繼東，「北宋對越南從『郡縣其地』到宗藩關係確立的轉變」，**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河南），第 41 卷第 2 期（2008 年 3 月），頁 151~155。

註⑬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 18~21。

註⑭ 鄂爾多斯的沙漠化約起自北魏初期，北宋時夏州已經立於沙漠中，使得北宋在 994 年奪得此地時不得不放棄此城。**續資治通鑑長編**亦記載宋臣曾布稱：「朝廷出師常爲西人所困者，以出界便入沙漠之地，七八程乃至靈州。既無水草，又無人煙，未及見敵，我師已困矣」。請見（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頁 5092；何彤慧、王乃昂、李育、馮文勇，「歷史時期中國西部開發的生態環境背景及後果－以毛屋素沙地爲例」，**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寧夏），第 28 卷第 2 期（2006 年），頁 28。

註⑮ 李華瑞，前引書，頁 63~66。

註⑯ 同前註，頁 409。

註⑰ 梁利，「從『聯麗制遼』到『聯金滅遼』—論 10-12 世紀東北亞的戰略格局及宋朝的戰略對策」，**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河南），第 2 期（2005 年），頁 101~105；陶晉生，前引書，頁 173~179。

在 1070 年代初期與 1087 年後兩度出現遼、夏、蕃三國同盟。⑱這些發展迫使北宋逐漸改變過於依賴安撫型大戰略的行爲，奪取宋夏邊界處戰略要地以改善戰略劣勢的防禦型構想逐漸被提出討論與付諸實行。⑲北宋無力制服西夏以及遼趁宋夏戰爭從中牟利的行爲，刺激了部分北宋戰略家的心理，⑳至宋神宗時遂產生被稱爲「開疆拓土」的攻勢／擴張戰略，意欲藉由奪回河湟來穩固西北安全，並進一步擊破西夏與奪回鄂爾多斯，同時輔以聯盟戰略擊敗遼國、奪回燕雲十六州。此一大戰略的目標並不限於西北，北宋同樣也因爲與交趾之間的領土爭端，而再度將交趾視爲擴張的目標。㉑因此從 1070 年王韶經略熙河起，北宋先後與西夏、交趾、青唐、遼發生戰爭。

南宋全期的結構由於其本身據有長江流域，而金、蒙古控制華北與草原，因此皆爲兩極。南宋的大戰略是明顯的依靠歲幣爲主的安撫型與依靠地形所建構的防禦型並用，此肇因於結構的地緣政治模式變化與地緣政治特徵：連通長江、淮河與黃河的汴河因戰亂、黃河次數逐漸增加的氾濫、人爲決堤與改道，而逐漸喪失通航功能，無法成爲破壞平行河川體系的戰略交通線；南宋與金多以大型天然障礙物爲國界，唯一的陸上交通線中心襄陽周邊又爲兩國分佔，㉒不利於彼此向對方發動攻勢；南宋與西夏隔著金，關係疏遠也難以發展聯盟戰略。㉓南宋雖建立強大且擁有輝煌戰績的海軍，但其地位與戰略始終附屬於陸軍之下，未發展出制海權與海上戰略進攻思想，㉔再加上南宋眞正的戰略重心是爭奪四川、京湖、江淮等戰略要地的控制權，海軍對此的幫助甚微小。最後，南宋聯蒙古滅金並非攻勢／擴張的表現，這是金決定以南宋做爲新的領土與抗蒙基地來源而先行攻宋之後的反應，因此實際上是一種積極防禦的展現。㉕

註⑱　遼、夏、宋、青唐之間的戰略關係錯綜複雜，其同盟發展可參考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34~138；李華瑞，前引書，頁 394~412；鍾美珠譯，長澤和俊著，前引書，頁 364~369。

註⑲　李華瑞，前引書，頁 53~61；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頁 15~25。

註⑳　陶晉生，前引書，頁 135。

註㉑　湯佩津，「北宋的南邊政策：以交趾爲中心」，頁 154~155、172~175。

註㉒　姚建根，「南宋的國防體系：以制置使戰區制度爲中心」，**洛陽師範學院學報**（河南），第 29 卷第 3 期（2010 年 6 月），頁 112。

註㉓　李華瑞，前引書，頁 104~117。

註㉔　對南宋海軍的編制、在大戰略中的地位、戰略部署與戰略思想的研究相當少見，本文主要參考王青松，「南宋海防初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14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98~107；王青松，「海軍在南宋國防中的地位與作用」，**南都學壇**（河南），第 24 卷第 3 期（2004 年 5 月），頁 35~36。

註㉕　伍純初，「南宋『聯蒙古滅金』政策形成原因分析」，**棗莊學院學報**（山東），第 24 卷第 6 期（2007 年 12 月），頁 21~23。

六、元朝與明朝

元朝的成立完全改變了結構自西周以來的形式與性質，明朝則承接其基礎，直到清朝才再度發生轉變，因此本文將元、明兩朝的結構一併分析。

元朝時的結構在自然地理上正逢北宋以來氣候逐漸乾冷化的「小冰期」(Little Ice Age)。⑯氣候變遷使黃河自北宋開始長期氾濫，導致華北的運河系統失去功能，不復爲戰略交通線，天災造成的農作歉收也加劇了農耕領域中的暴動頻率。⑰乾冷化也使大絲路慢慢失去東西交通幹線地位，中國更難以利用大絲路支配西域。但游牧民族則因此強化對西域的控制，蒙古四大汗國中的察合台汗國佔據西域與準噶爾，該兩地此後成爲重要的草原力量中心，出現許多強大的游牧國家。鄂爾多斯地區的沙漠化亦使中國難以再將該地做爲戰略前線。自然地理對經濟地理的影響連帶造成人爲的結構變化，元、明、清三代的政治中心完全東移至遠離傳統歷史核心的北京或不受黃河流域水患影響的南京，迫使帝國開鑿京杭大運河連接長江中下游與北京。草原地區的政治中心則同時出現東移與西移，蒙古帝國最初的政治中心位於靠近呼倫貝爾的克魯倫河畔，其後雖轉移至漠北的和林，但北元、韃靼與後金／清的活動範圍皆位於內蒙古東部與滿州，另外瓦剌的活動範圍在準噶爾。政治中心的東移與大絲路戰略價值的下降，使中國的戰略重心進一步完全轉移至東亞東部。

元朝的霸權結構中有兩大地緣政治力量影響其大戰略。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是其他蒙古汗國，特別是中亞的察合台汗國與窩闊台汗國對元世祖取得汗位的不滿。第二則是元朝欲將周邊國家甚至日本、爪哇等國納入朝貢體系中。大體上元世祖的大戰略以攻勢／擴張爲主，只有在北部採取戰略防禦，此因西方汗國離元朝政治中心極爲遙遠，即使聯絡蒙古東部的諸王一起進攻，元朝卻又擁有內線優勢。與元朝五度出兵征討安南、緬甸與占城，以及兩度跨海遠征日本，和一次進攻爪哇相比，西方汗國對元朝發動的大型攻擊僅有三次 (1275-76、1286-89、1298-1301 年)，而且只有一次曾攻入和林，其他最多只能威脅土魯番與別失八里 (庭州)。但元朝在南方的遠征同樣受困於自然地理而以失敗收場，不過因元朝已成爲霸權，安南、緬甸等國仍在戰後朝貢元朝，而相隔大海的日本與爪哇則始終沒有加入朝貢體系。元朝與西方汗國之間的戰爭則在元世祖與窩闊台汗國君主海都去世後迅速消失，並在 1310 年以元、察合台汗國瓜分窩闊台汗國結束。霸權結構中主要威脅的消失以及限制元朝擴張的自然地理環境，使得元朝大戰略在元世祖之後迅速轉爲防禦型。

明朝初年 (1368-1434) 因北元、韃靼皆未能控制草原絲路故爲單極結構，明朝中期以後則爲明朝先後與瓦剌、韃靼對峙的兩極結構。儘管結構中存在明顯的威脅，明

註⑯ 劉昭民，**中國歷史上之氣候變遷**，頁 116~174。

註⑰ David D. Zhang, Jane Zhang, Harry F. Lee, and Yuan-qing He, "Climate Change and War Frequency in Eastern China over the Last Millennium," *Human Ecology*, Vol. 35, No. 4 (August 2007), pp. 403~414.

朝大戰略卻與北宋同樣以防禦型與安撫型並用，⑫只在明成祖時期才有較明顯的攻勢／擴張傾向。此因元朝統治中國是華夏文明前所未有的巨大戰略與文化衝擊，如何防止游牧勢力捲土重來是明朝大戰略的首要目標。⑫然而有兩大單元層級變數促使明朝無法採用攻勢／擴張大戰略。第一是戰略要地的爭奪，明朝首都先於南京後遷北京，後者有「三面近塞」的缺點，⑫漢武帝時曾「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⑬顧祖禹則指出內蒙古與遼東草原的前進據點與北京的關係一如鄂爾多斯與河西走廊之於關中，⑬但明成祖在經濟與戰略形勢等綜合因素下認爲草原地區再無力支撐前線防禦，將部分防線讓與明朝的「兀良哈三衛」蒙古部落爲畜牧場，⑬撤廢至關重要的開平、大寧、東勝、遼陽諸衛，北京之外幾無任何戰略要地，首都防禦既爲最主要的戰略任務，自然無暇顧及擴張。東勝衛撤除更使蒙古人在土木堡之變（1449 年）後毫無阻礙地大量移入河套與鄂爾多斯，明朝失去對此地的控制後，戰略焦點也就只能是收復鄂爾多斯以取得更好的防禦條件，或採取完全的靜態防禦。⑭

第二、「幽燕…去關中爲尤遠」，南京距關中更遠，因此明朝完全無心於西北，再加上氣候乾冷化等不利因素，爲了避免分散力量，明太祖一度想放棄甘肅、寧夏等地。⑮明朝長城止於嘉裕關而不是更西北的玉門關，對西域僅利用游牧政權「哈密國」作爲其在新疆的代表，完全沒有派軍進駐，始終視西域爲戰略弱點，故在哈密國先後受到瓦剌與東察合台汗國的攻擊時，表現出「三立三絕」的態度，但與東漢的「三絕三通」相反，明朝最後放棄了哈密國，並將原設於其境內的「哈密衛」東遷至甘肅境內，⑯連帶失去對西域諸國的影響力，無法藉此牽制蒙古，使其邊防政策更加被動。⑰但反過來說，戰略重心東移使明朝重視對東部威脅較大的兀良哈三衛與女

註⑫　明朝早在 1372 年就因在「嶺北之役」中爲北元所大敗而轉變爲攻防並重，開始建立後來有名的邊防體系「九邊」。不過明朝也試圖與蒙古以貿易交換和平，最著名的就是 1570 年的「俺答封貢」，支持者認爲「朝廷若允俺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財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可見是安撫型與防禦型並用的戰略思想。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pp. 76~79；韋占彬，「明代『九邊』設置時間辨析」，**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學報**（河北），第 4 卷第 3 期（2002 年 9 月），頁 44~47；鄧沛，「明代『九邊』考述」，**綿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四川），第 18 卷第 4 期（1999 年 8 月），頁 57~59；田澍、毛雨辰，「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明代西北邊鎮研究述評」，**西域研究**（新疆），第 2 期（2005 年），頁 105~108；（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2235~2236、8464、8486。

註⑬　**明史**分析明朝邊防的主要原因，第一個便是「元人北歸，屢謀復興」。（清）張廷玉等撰，**明史**，頁 2235。

註⑭　同前註。

註⑮　馬持盈，**史記今註**，頁 2921。

註⑯　（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頁 403~404。

註⑰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頁 2236。

註⑱　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pp. 91~107, 122~139.

註⑲　趙現海，「洪武初年明、北元、高麗的地緣政治格局」，**古代文明**（吉林），第 4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91。

註⑳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頁 8525~8526。

註㉑　王璐，「永樂年間北邊防禦政策透視－從明朝中原與西域貿易談起」，**塔里木大學學報**（新疆），第 18 卷第 1 期（2006 年 3 月），頁 66。

貢，迫其替明朝抵擋其他蒙古部落的壓力，明朝「邊牆」爲了防禦兀良哈三衛的遼東邊牆中段與西段也是最早興建的部分。⑬⑧

只有在蒙古壓力減輕時，明朝大戰略才有轉變的可能。**皇明祖訓**提出 15 個「不征之國」，實際上是明朝在未解除蒙古的戰略壓力之前根本無力征討的間接證明：不征伐的原因是「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結尾又說「胡戎與中國邊境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警備之」，⑬⑨很明顯是地緣政治考量之下的政策宣示。⑭⓪明成祖之所以能派遣鄭和下西洋，並趁安南內亂將其併吞、在西域設立哈密衛與在滿州中北部設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主要就是北元徹底滅亡（1402 年），而韃靼與瓦剌仍不成氣候、兀良哈部臣服於明朝的緣故。明成祖五次北伐韃靼與瓦剌（1409-1424 年）雖然嚴重削弱兩國實力，但明朝同樣耗費過鉅，不得不在明宣宗時完全停止下西洋（1433 年）與放棄安南（1427 年）。鄭和下西洋帶有濃厚的攻勢／擴張意涵與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成分，**明史**指出其目的與手段是「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⑭①而併吞安南則有助於鄭和下西洋：「是時，交阯已破滅，郡縣其地，諸邦益震讋，來者日多」。⑭②此外，鄭和的艦隊亦在麻六甲海峽（Strait of Malacca）建立重要的海外基地以維持其遠航的補給。⑭③最後一次遠航的原因是明宣宗認爲「以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於是和、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⑭④意欲威壓遠方國家再度加入朝貢體系。

七、清朝

清朝崛起於靠近內蒙古的滿州南部，與游牧、農耕兩文明均有長期的接觸，熟悉二者的本質與政治制度，又同時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威脅。後金／清朝初期的結構是以明朝爲超強的單極結構，草原地區則有後金／清、漠南蒙古（韃靼後裔）、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或稱厄魯特蒙古，分爲準噶爾的瓦剌後裔準噶爾部、青康藏高原的和碩特部，位於伏爾加河（Volga River）流域的土爾扈特部）等分立。⑭⑤後金／清相當注意對蒙古的控制，消極面是解除其潛在威脅，積極面則是藉此增強力量，因此其對蒙古的戰略手段是攻勢／擴張與安撫型並用，既有軍事征討，也有聯姻、納貢等手段，其

註⑬⑧ 景愛，前引書，頁 290、296~297。

註⑬⑨ 朱元璋口述，吳相湘編，**明朝開國文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 年），頁 1588~1589。

註⑭⓪ Jackob J.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graphical Change*, pp. 140~141.

註⑭①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頁 7766~7767。

註⑭② 同前註，頁 7767。

註⑭③ 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p. 88~98.

註⑭④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頁 7768。

註⑭⑤ 黑龍，「噶爾丹統治時期的準噶爾與清朝關係研究」，內蒙古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5 年），頁 10~11。

中對最靠近的漠南蒙古是「臨之以兵，懷之以德」，⑯對較遙遠的漠北蒙古與漠西蒙古則以政治分化手段爲主，軍事遠征爲輔。然而一如遼、金的前例，政治中心東移的帝國會因爲距離與戰略環境的差異（森林草原環境與草原沙漠環境）而很難順利控制漠北與西域，假使在農耕領域有更大的利益牽扯迫使其戰略重心置於南方的話更難在草原地區有所作爲。因此清太宗雖然征服漠南蒙古並以蒙古大汗自居，但無法控制漠北與漠西蒙古，後兩者甚至在 1640 年組成同盟共同對抗清朝。⑰清朝入關後戰略方向轉移，爲了攻取中國並壓制反清勢力，依然對蒙古實行政治分化爲主、軍事征服爲輔的大戰略，即使在 1646 年遠征漠北蒙古大勝後還是採取安撫型戰略而非直接控制，⑱對於緊鄰河西走廊與甘肅、四川的和碩特部則採取冊封的方式維持友好關係，並拉攏西藏，以宗教牽制信仰喇嘛教的漠北與漠西蒙古。⑲然而清朝與更遙遠的準噶爾部甚少互動，直到 1672 年才與準噶爾汗國開始發展密切的政經關係。

結構在 1680 年代的發展使清朝大戰略逐漸發生變化：清朝在 1683 年完全平定三藩之亂與消滅臺灣的明鄭；準噶爾亦在 1682 年完全控制新疆，並在 1685 年平定吉爾吉斯，成爲清朝在結構中唯一的對手，雙方逐漸圍繞漠北蒙古發生爭執。準噶爾在 1688 年東進消滅了漠北蒙古，但殘存的漠北蒙古諸部卻投降清朝，這使清朝認爲漠北應受其控制，戰略性質開始轉趨積極，導致在 1690 年爆發準清戰爭。⑳清朝藉此完全控制了漠北蒙古，㉑並對向來與準噶爾聯合的青海和碩特部與西藏建立羈縻性的控制，㉒結構轉爲霸權。但未消滅準噶爾使結構中仍留有潛在威脅，準噶爾的領土野心依然持續，其在 1716 年佔領西藏與青海導致第二次準清戰爭，清朝在 1725 年擊敗準噶爾後才眞正控制西藏與青海，㉓但準噶爾依然強盛，在 1732 年再度進攻漠北而爆發第三次準清戰爭，後者雖然又戰勝準噶爾，但對於準噶爾始終感到難以處理，因此大戰略仍然保持攻勢／擴張性質，終於在 1755-1757 年利用準噶爾內亂的機會將其完全

註⑯　穆崟臣，「試論清朝治理東蒙古的政策和措施」，**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內蒙古），第 26 卷第 3 期（2005 年 5 月），頁 50。

註⑰　烏云畢力格，「清太宗與喀爾喀右翼札薩克圖汗素班第的文書往來—兼談喀爾喀—衛拉特聯盟的形成」，**西域研究**（新疆），第 2 期（2008 年），頁 1~8、130。

註⑱　齊木德道爾吉，「1640 年以後的清朝喀爾喀關係」，**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內蒙古），第 4 期（1998 年），頁 12~20。

註⑲　佟佳江，「清朝統治蒙古的體制—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內屬蒙古」，**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內蒙古），第 6 期（1998 年），頁 36~41；王景澤，「清朝的黃教政策與蒙古社會」，**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吉林），總第 195 期（2002 年），頁 34~40；湯代佳，「青海厄魯特蒙古與清朝之早期關係述略」，**青海民族研究**（青海），第 12 卷第 3 期（2001 年 7 月），頁 59~60。

註⑳　關於準清兩國爲了漠北蒙古而爆發戰爭的過程，請參考黑龍，「噶爾丹統治時期的準噶爾與清朝關係研究」，頁 58~75。

註㉑　黑龍，「喀爾喀蒙古附清考述」，**滿族研究**（遼寧），第 3 期（2008 年），頁 60。

註㉒　湯代佳，「青海厄魯特蒙古與清朝之早期關係述略」，頁 60~61；牛海楨、李曉英，「簡論清朝初年對青海蒙古的政策」，**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甘肅），第 35 卷第 2 期（2007 年 3 月），頁 114。

註㉓　牛海楨、李曉英，「簡論清朝初年對青海蒙古的政策」，頁 115~117。

擊敗，清高宗在 1757 年下令對準噶爾進行種族清洗以徹底消滅其在新疆與中亞的勢力。⑭此後清朝大戰略轉爲防禦型與安撫型，只有清緬戰爭（1762-1769）比較具有攻勢防禦性質，⑮其他與安南（1789 年）、尼泊爾廓爾喀王國之間在西藏的戰事（1791-92 年），大致上屬於純粹防禦型戰爭。⑯

伍、結　論

本文概略地分析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對中國歷代從西周至鴉片戰爭前的大戰略的影響。封閉的東亞地緣政治結構使華夏文明諸國特別重視中原的爭奪，對東亞以外特別是隔海才能抵達的地區不感興趣，甚至視這些地區爲毫無幫助的蠻荒之地，不僅使中國無從發展出海權思想，也決定了中國在古代幾乎不可能向海外發展。這種帶有種族歧視的戰略思想是否能等同於中國具有不對外擴張的戰略傳統甚有商榷的餘地，因爲中國領土內經常包括許多與華夏文明在種族與文化上相當不同的半獨立「地方政權」，特別是西南與西北地區，而中國經常憑藉這些地方政權替其實現「天子守在四夷」的政治理想，長此以往，這些地區就成了中國的「邊疆」。而這些邊疆地區實際上卻又都是中國古代擴張的極限，因此中國的戰略傳統究竟是不擴張，還是「擴張到無法再擴張」，似乎頗有探討空間。

本文不認爲中國大戰略受到儒家文化的主導，誠然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時候沒有擴張紀錄，但這主要基於地緣政治結構變遷使然：春秋戰國時代行之有效的征服戰略經驗對秦漢以後的帝國逐漸不適用，過去的被征服者皆位於中原之內，其後所面對的威脅則在中原之外，趙、燕、秦、漢只是「擊敗」而從未「征服」這些民族。想要「征服」就必須將不適合農業發展、中原民族難以生存的草原與沙漠納爲領土；游牧民族沒有固定的政治重心，在廣袤的草原與沙漠中逐水草而居，華夏帝國必須在毫無農業聚落與中原民族生存的地區作戰，既難以得到良好的補給與情報，又容易因水土不服影響作戰效率，很難達到徹底征服的戰略目標。⑰即使是在朝鮮半島、雲貴地區與中南半島，同樣存在補給線過長、容易水土不服等嚴重的後勤問題。秦朝與隋朝迅速滅亡，以及漢武帝遠征匈奴導致國庫空虛的教訓，使往後的帝國不敢過分倚賴武力的使

註⑭ 相關記載可參考（清）傅恆等奉敕撰，**平定準噶爾方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358~632；烏云畢力格、成德崇撰，伊克昭盟蒙古民族通史編委會編，**蒙古民族通史**（內蒙古：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184~185；（清）魏源撰，**聖武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56。

註⑮ 楊煜達、楊慧芳，「花馬禮：16-19 世紀中緬邊界的主權之爭」，**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14 卷第 2 期（2004 年 6 月），頁 72~80。

註⑯ 孟森，**清史講義**（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 年），頁 350。

註⑰ 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是最早反對以這種方式出兵匈奴的人，請見馬持盈，**史記今註**，頁 2968。

用，長治久安還是依靠政治制度、經濟、文化等其他手段的幫助才能確保。⑱不傾向用兵的立場有時則受到所謂的「內政導向大戰略」的影響，⑲這種戰略目的爲藉由整頓中國的內政來提高中國的整體國力，以便在戰爭中能出動更強大的實力。

不過儒家的柔性戰略文化也未必只是政治宣傳，西周的畿服制度在後來轉變爲朝貢與冊封制度，在降低帝國對外消耗、維持國家安全與維持體系均衡實有一定的效用，其他東亞國家只要犧牲名義上的主權，即可獲得相當的政治與經濟利益，而中國則可滿足其政治虛榮心。然而這只有結構中完全不存在其他強權時才得以實現並推廣至整個體系，因爲朝貢體系可能會阻止大國實現與中國抵觸的重要地緣政治利益。朝貢體系在南方與朝鮮半島得以維持，與其說是「和平」戰略文化的表現，毋寧說是中國在沒有嚴重安全威脅又無力擴張的地區，爲了避免分散力量，並滿足儒家「休養生息」和「天朝聲威」的虛榮心，而朝貢國爲了從貿易中得利，並希望得到中國的政治支持與安全保護，彼此各取所需的一種行爲，並非和平戰略文化的影響，否則中國就不會在對其沒有嚴重威脅的越南與朝鮮多次用兵。

最後，本文從物質結構層次進行研究，但另一個屬於單元層次與個人層次而有待開發的地緣政治學與大戰略研究領域是地緣政治結構、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次文化（Strategic Subculture）三者的綜合研究。絕大多數國家對外行爲都是以根植在歷史中的民族與個人的特色與傳統爲來源的內在驅動力，與以地理和經濟誘因爲主的外在導引力作用下的產物，⑳因此戰略不是單純固定的教條，而是一種思想方法，目的是整理事件，將它們按照優先次序加以排列，然後再選擇最有效的行動路線。㉑持不同戰略次文化與地緣政治密碼的戰略菁英如何影響戰略決策，㉒是結構與國家層次無法解釋的部分，例如北宋轉入戰略防禦與明朝沒有在東南亞進行更進一步的擴張等重要的戰略轉折。然目前仍少有學者對此深入研究，未來這或許是地緣政治學可以從個人層次觀點來補充戰略文化變遷研究的結構與國家層次解釋力的不足之處。

*　　*　　*

（收件：99 年 1 月 22 日，複審：100 年 4 月 18 日，修正：100 年 5 月 16 日，接受：100 年 9 月 8 日）

註⑱　賈誼的**過秦論**即爲此種觀點的最佳說明，認爲秦朝之所以在短時間內滅亡，是因爲「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錢伯城編，**新編古文觀止（上）**（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頁 161。

註⑲　內政導向大戰略以北宋最爲明顯，可參考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05~111。

註⑳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Physical Basis of Political Geography,”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Vol. 6, No. 2（February 1890）, p. 84.

註㉑　鈕先鍾譯，André Beaufre 著，**戰略緒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頁 16。

註㉒　西漢的**鹽鐵論**記載漢昭帝時期中央卿大夫與「賢良文學之士」之間關於對匈奴戰略的大辯論即爲一例，其間充滿了兩派戰略菁英對地緣政治密碼的不同解構。朱中博、汪寧，「《鹽鐵論》與古代中國戰略文化」，**國際政治科學**（北京），總第 12 期（2007 年 4 月），頁 85~103。

East Asian Geopolitical Structure and Its' Impact on the Variation of Ancient China's Grand Strategies

Chun-ping Wang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Geopolitical structure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s of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power gravity and resources. It differentiates shapes of structure by considering whether state can control the strategic line of communication of structure, and focuses on the strategic behavior between structure and the geopolitical features of every unit at each level, including geostrategic realms, regions, and states. State's strategic behavior in a certain era is influenced by its own geopolitical settings and the structure. Historically, East Asia is a closed regional geopolitical structure, but the dominating state of East Asia, China, is rarely a hegemony. The shapes of structure change between non-polarity, unipolarity, bipolarity, multipolarity, and tripolarity. China therefore usually competes with other power centers in controlling areas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a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with other important defense or economic interests. The grand strategies of ancient China from Western Zhou were usually offensive/expansionist oriented consequently, but also with accommodationist character to avoid fighting simultaneously. During the Song and the Ming dynasties, offensive/expansionist is replaced by defensive strategy due to significant structural changes. Only in the mid-Eastern Han and Qing, there were no real challengers in the hegemonic structure, accommodateonist thus predominates the preferences of grand strategy.

Keywords: East Asian geopolitical structure; China; grand strategy

參 考 文 獻

(宋) 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第 4 版 (臺北：世界書局，1983 年)。
(宋) 歐陽修、宋祈同撰，**新唐書** (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唐) 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誌**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
(唐) 魏徵等撰，**隋書** (臺北：鼎文書局，1975 年)。
(清) 張廷玉等撰，**明史** (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清) 傅恆等奉敕撰，**平定準噶爾方略**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清) 魏源撰，**聖武記** (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清) 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 (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丁力，**地緣大戰略：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及其戰略選擇**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
丁士中，「中國古代天下觀與戰略文化—以兩漢及隋唐對外和戰思想爲例」，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 年)。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
王吉林，**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 (新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年)。
王青松，「南宋海防初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北京)，第 14 卷第 3 期 (2004 年 9 月)，頁 98~107。
_____，「海軍在南宋國防中的地位與作用」，**南都學壇** (河南)，第 24 卷第 3 期 (2004 年 5 月)，頁 35~36。
牛海楨、李曉英，「簡論清朝初年對青海蒙古的政策」，**蘭州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甘肅)，第 35 卷第 2 期 (2007 年 3 月)，頁 113~117。
王景澤，「清朝的黃教政策與蒙古社會」，**東北師大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吉林)，總第 195 期 (2002 年)，頁 34~40。
王雲五編，李宗侗註譯，葉慶炳校訂，**春秋左傳今註今譯**，校訂版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
王璐，「永樂年間北邊防禦政策透視－從明朝中原與西域貿易談起」，**塔里木大學學報** (新疆)，第 18 卷第 1 期 (2006 年 3 月)，頁 66。
王繼東，「北宋對越南從『郡縣其地』到宗藩關係確立的轉變」，**鄭州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河南)，第 41 卷第 2 期 (2008 年 3 月)，頁 151~155。
世界書局編輯部編，**新校後漢書注**，第 3 版 (臺北：世界書局，1974 年)。
史子正，**太平寰宇記** (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年)。
史念海，「春秋以前的道路」，史念海主編，**河山集・七集** (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1999 年)，頁 114~131。

_____，「戰國時期的交通道路」，史念海主編，**河山集・七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34~166。

_____，**唐代歷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田澍、毛雨辰，「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明代西北邊鎮研究述評」，**西域研究**（新疆)，第 2 期（2005 年)，頁 105~108。

伍純初，「南宋『聯蒙古滅金』政策形成原因分析」，**棗莊學院學報**（山東)，第 24 卷第 6 期（2007 年 12 月)，頁 21~23。

朱中博、汪寧，「《鹽鐵論》與古代中國戰略文化」，**國際政治科學**（北京)，總第 12 期（2007 年 4 月)，頁 85~103。

朱元璋口述，吳相湘編，**明朝開國文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 年)。

何彤慧、王乃昂、李育、馮文勇，「歷史時期中國西部開發的生態環境背景及後果－以毛屋素沙地爲例」，**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寧夏)，第 28 卷第 2 期（2006 年)，頁 28。

佟佳江，「清朝統治蒙古的體制—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內屬蒙古」，**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內蒙古)，第 6 期（1998 年)，頁 36~41。

吳景山，「後突厥汗國的政治制度辨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甘肅)，第 4 期（1995 年)，頁 38~41、56。

宋杰，**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

杜永吉，「論中國戰略文化的近代流變」，**軍事歷史研究**（上海)，第 3 期（2005 年)，頁 143~145。

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2 年)。

李明偉，**隋唐絲綢之路－中世紀的中國西北社會與文明**（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 年)。

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李際均，**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年)。

李曉燕，「中國明代戰略文化與儒家文化一致性的研究－與江憶恩商榷」，**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0 期（2008 年)，頁 66~76。

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燕京學報**（北京)，新 13 期（2002 年 11 月)，頁 15~29、35。

周偉洲，「公元三至六世紀的南海諸國及其與中國南方諸政權之關係」，**燕京學報**（北京)，新 10 期（2001 年 5 月)，頁 109~118。

孟森，**清史講義**（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 年)。

林幹，**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通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林澐，「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燕京學報**（北京)，新 14 期

(2003 年 5 月)，頁 95~146。
門洪華，「中國戰略文化的重構：一項研究議程」，**教學與研究**（北京），第 1 期（2006 年），頁 59~60。
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國**（臺北：三民書局，1981 年）。
姚建根，「南宋的國防體系：以制置使戰區制度爲中心」，**洛陽師範學院學報**（河南），第 29 卷第 3 期（2010 年 6 月），頁 112。
韋占彬，「明代『九邊』設置時間辨析」，**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學報**（河北），第 4 卷第 3 期（2002 年 9 月），頁 44~47。
倪樂雄，**尋找敵人：戰爭文化與國際軍事問題透視**（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 年）。
宮玉振，**中國戰略文化解析**（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 年）。
席隆飛、楊熺、唐錫仁編，**中國科學技術史・交通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年）。
徐瑜，**孫子兵法：不朽的戰爭藝術**（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 年）。
烏云畢力格，「清太宗與喀爾喀右翼札薩克圖汗素班第的文書往來——兼談喀爾喀—衛拉特聯盟的形成」，**西域研究**（新疆），第 2 期（2008 年），頁 1~8、130。
_____、成德崇撰，伊克昭盟蒙古民族通史編委會編，**蒙古民族通史**（內蒙古：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 年）。
馬持盈，**史記今註**，第 3 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
張其賢，「『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東吳政治學報**，第 27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190~199。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
張登及，「理論改良還是缺口？－新現實主義與冷戰後中美地緣競爭的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3 期（2009 年），頁 11~17。
張榮芳、黃淼章，**南越國史**，第 2 版（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年）。
張睿麗，「王延德出使高昌使命補證」，**西域研究**（新疆），第 3 期（2003 年），頁 39~44。
梁利，「從『聯麗制遼』到『聯金滅遼』——論 10-12 世紀東北亞的戰略格局及宋朝的戰略對策」，**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河南），第 2 期（2005 年），頁 101~105。
許倬雲，**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年）。
陸俊元，**地緣政治的本質與規律**（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 年）。
陳彥良，「戰國迄漢初區域交通和市場網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5 年 12 月），頁 5~16。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年）。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 2 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曾培耿、唐家龍譯，Fernand Braudel 著，**地中海史**（第 1 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 年）。
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6 年）。
_____，**經略幽燕：宋遼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年）。
湯代佳，「青海厄魯特蒙古與清朝之早期關係述略」，**青海民族研究**（青海），第 12 卷第 3 期（2001 年 7 月），頁 58~61。
湯佩津，「北宋的南邊政策：以交趾爲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年）。
鈕先鍾，**大戰略漫談**（臺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7 年）。
_____，**現代戰略思潮**，再版（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
_____譯，Carl von Clausewitz 著，**戰爭論**（臺北：軍事譯粹社，1980 年）。
_____譯，André Beaufre 著，**戰略緒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
黑龍，「喀爾喀蒙古附清考述」，**滿族研究**（遼寧），第 3 期（2008 年），頁 60。
_____，「噶爾丹統治時期的準噶爾與清朝關係研究」，內蒙古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5 年）。
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98~230。
楊家駱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第 5 版（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
_____，**新校資治通鑑注**，第 4 版（臺北：世界書局，1972 年）。
楊煜達、楊慧芳，「花馬禮：16-19 世紀中緬邊界的主權之爭」，**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14 卷第 2 期（2004 年 6 月），頁 72~80。
楊寬，**戰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
趙文潤，「論唐文化的胡化傾向」，**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陝西），第 23 卷第 4 期（1994 年 12 月），頁 35~41。
趙現海，「洪武初年明、北元、高麗的地緣政治格局」，**古代文明**（吉林），第 4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91。
齊木德道爾吉，「1640 年以後的清朝喀爾喀關係」，**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內蒙古），第 4 期（1998 年），頁 12~20。
劉昭民，**中國歷史上之氣候變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
劉學銚，**五胡興華：形塑中國歷史的異族**（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4 年）。
_____，**北亞游牧民族雙軌政制**（臺北：南天書局，1999 年）。
蔣君章，**政治地理學原理**（臺北：中外出版社，1976 年）。
鄧沛，「明代『九邊』考述」，**綿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四川），第 18 卷第 4 期（1999 年 8 月），頁 57~59。
穆崟臣，「試論清朝治理東蒙古的政策和措施」，**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內蒙古），第 26 卷第 3 期（2005 年 5 月），頁 49~53。

錢伯城編，**新編古文觀止（上）**（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
薛正昌，「蕭關道與固原歷代政權建置及其發展」，**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甘肅），第 1 期（1994 年），頁 64~71。
鍾美珠譯，長澤和俊著，**絲綢之路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 1-2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Agnew, John,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Buzan, Barry, "Beyond Neorealism: Interaction Capacity," in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eds.,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4.
_____, "Rethinking System and Structure," in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eds.,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67~69.
_____,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04.
Cohen, Saul B.,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Di Cosmo, Nicola, *Ancient China and Its Empir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Dollfus, Oliver, "The World System," *Geopolitics*, Vol. 5, No. 2 (Autumn 2000), pp. 59~60.
Grygiel, Jakub J., *Great Powers and Geographical Chang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Jervis, Robert,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pp. 167~214.
Johnston, Alastair Iai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Lattimore, Owen,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Their Tribal Divisio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and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 (New York: H. Fertig, 1969).
Levathes, Louise,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Luttwak, Edward,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Mackinder, Halford J., "The Physical Basis of Political Geography,"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Vol. 6, No. 2 (February 1890), p. 84.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Ó Tuathail, Gearóid, 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 *The Geopolitics Reader*（London: Routledge, 1998）.

O'Loughlin, John ed., *Dictionary of Geopolitics*（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4）.

O'Sullivan, Patrick, *Geopolitics*（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Parker, Geoffrey,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London: Printer, 1998）.

Sloan, Geoffrey and Colin S. Gray, "Why Geopolitics?" in Colin S. Gray and Geoffrey Sloan eds.,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London and Portland, Oreg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pp. 1~3.

Taylor, Peter J.,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3rd ed.（Essex, England: Longman, 1993）.

Trevelyan, George M., *History of England*, illustrated ed.（London,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58）.

Van Evera, Stephen,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Spring 1998）, p. 19.

Waldron, Arthur,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Walt, Stephen M.,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Spring 1985）, pp. 9~12.

Wang, Yuan-k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Zhang, David D., Jane Zhang, Harry F. Lee and Yuan-qing He, "Climate Change and War Frequency in Eastern China over the Last Millennium," *Human Ecology*, Vol. 35, No. 4（August 2007）, pp. 403~414.